



2011年11月30日13期

总第七十八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争鸣】

[阎长贵 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

[李 逊 对韩爱晶《清华蒯大富》中一个历史细节的勘误](#)

【九一三】

[蒋 健 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一）](#)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红”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九](#)

【简讯】

[樵 余 王广宇回忆录《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问世](#)

【小资料】

[边 犍 近年高校文革研究学位论文篇目计略](#)

【编读往来】

[1、向明谈向红文](#)

[2、向红对《四十年有感》的更正](#)

[3、于永发对《四十年有感》的质疑](#)

[4、向红答于永发](#)

[5、印红标谈新疆一文的注释](#)

[6、陈益南谈余汝信、程光文](#)

[7、福建读者致《记忆》](#)

[8、顾训中谈余汝信、程光文](#)

[9、叶京生谈余汝信、程光文](#)

[10、一平谈《我的一九七一》](#)

【争鸣】

究竟谁利用谁？

——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

阎长贵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决议》文革部分的核心观念。《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义虽然仅有 42 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就试着来对它进行一番分析和评论。

—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这个说法由 1966 年 5 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 5 月 16 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通知》（1967 年 5 月公开发表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称《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 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 1966 年 10 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

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对此，历史、现实和人们的广泛舆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年，在一次纪念文革中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革命（也是“两头真”的人物）听到关于文革“定义”中的这个说法时大声吼道：“究竟谁利用了谁？”这种不满和愤怒的话语，使我震惊，也使我醒悟，这句话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脑海里，终生难忘。三十年后回顾和讨论座谈《决议》，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为题做文章。

二

所谓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究竟谁利用了谁？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们看看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

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 100 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年一书信选辑》，载《记忆》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他怎么会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还是毛泽东吗？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这究竟是如实地述说（莫说歌颂）毛泽东，还是贬低毛泽东？无疑是贬低毛泽东！完全彻底地贬低毛泽东！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认可“被利用说”，一定要走到这种尴尬境地……

王年一先生告诉我们，“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他们在文革中有错误有罪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有人要替他们涂脂抹粉，做这样或那样的掩饰，都是不应该的，徒劳的。对林彪、江青，也应该和必须实事求是，即：既不能丑化，也不能掩饰，一定要遵循古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年一先生又告诉我们：“‘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不是林、江作出的。”因此，林、江做坏事，“都是在毛‘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王年一先生还特别说到：“江在打到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说到这个问题，不禁想起吴法宪的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8 页）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决议》关于“文革定义”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们在他提供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发挥。

三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他们二人经常互相利用(在这里，“利用”不是作为贬义词)，那是很自然的，人们不必说什么。至于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江青无疑有利用毛泽东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泽东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几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江青还叫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

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告诉邓小平等人对江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陈伯达告诉他们，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这样意思的话。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这样说也是传达的她爸爸

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很难一下子想起说这个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毛泽东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还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所以，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民意”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鲜明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违反毛泽东意愿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正义行动，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情有可原，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问题，我觉得恐怕是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

一个重大课题，应该和需要认真研究；台湾还有《毛泽东与江青》的专著，我们不是更应该有吗？恐怕还应该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预期和断言，有志于此者，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无量！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惜身体不好，并且垂垂老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期盼着，热切地期盼着关心和有兴趣的人来做这个研究；如有，我愿尽绵薄之力，说说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以供参考和讨论），和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资料。

四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文革中他们二人究竟谁利用谁？当然，说林彪一点没有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对。从 1958 年开始，毛泽东明确提出希望有个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屡屡极力吹捧毛泽东，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其中有没有提高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动机呢？林彪当了国防部长，特别是“接班人”之后，压制、排斥和打击自己不满和看着不顺眼的干部，对别的派系（或曰山头）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泽东的同意和认可下，把军委办事组这个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搞成主要成员都是红“双一”（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人（叶群不是红“双一”，但是他妻子），等等，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举几件事实。

关于打倒罗瑞卿。这是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的事情。罗瑞卿是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他是怎样被打倒的？为什么被打倒？到现在为止，我们党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他们说，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6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的妻子叶群说什么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篡军夺权”等等；这样说来罗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说，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仿佛”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别是起草《决议》的人看来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

其实，这个问题得从 1959 年的庐山会议说起。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

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上山，投入对已经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彭德怀的大批判。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卷 367 页）。从 1963 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就亲近、密切了，加上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也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对罗瑞卿确有不满意，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下爱将，是他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同时他也知道罗瑞卿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是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所谓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之前，叶剑英就已经按毛泽东的授意向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谈到罗瑞卿的问题了（《邱会作回忆录》377—381 页，《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 11 页）。

“九一三事件”后为掩人耳目，毛泽东把他打倒罗瑞卿说成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是林彪诬陷和诬告罗瑞卿等等，实际上，打倒罗瑞卿是他利用军队的派系（或曰“山头”）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和罗瑞卿的矛盾，而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很显然，打倒罗瑞卿不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到现在我们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所谓“相互勾结”，姑且不论，只说“相互利用”；而只要讨论清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们“相互利用”吗？

如上所说，这个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去找林彪“请尊神”。“尊神”者，军队也。为什么要请“尊神”？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这段讲话很值得注意。

是“林彪同志委托”和“完全支持”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吗？非也。“完全支持”是一句虚语，而“林彪同志委托”则是毛泽东在修改《纪要》时加上的。对这一点，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作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参加者和《纪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后写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重复着“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话头，但他还是揭明了“林彪同志委托”是毛泽东所加的真相。他说题目原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说：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江青在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中，开头就说：“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又说，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补充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刘志坚说，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这也就是江青在3月19日给林彪信中所说“根据你的委托”的来源——笔者）”。（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回首文革》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28、333—334页）

明明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在那种情况下，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

青同志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按：请注意这个“她”字——笔者）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林彪对毛泽东在标题上添加的“林彪同志委托”，不置可否，淡然处之；他这种态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意思？其潜在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所想象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北京没有报纸及时转载，毛泽东很生气，在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不订，——作为独具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在指挥打仗时，非常“慎重初战”，“首战必胜”，初战失利，他是很难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把《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加上这六个字，意义非同小可。其一，不仅使江青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纪要》是江青在大跃进失败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纪要》，毛泽东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谓“委托”江青的林彪则一字未动。在这个意义上，《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请人们看看，部队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其《纪要》的产生过程，究竟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还是林彪利用毛泽东？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什么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吗？！

关于“借助钟馗”。对这个问题，要弄清到底谁是“钟馗”（古代民间传说中的“赐福镇宅圣君”）？谁要借助钟馗打鬼？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518 讲话”，其中讲到政变问题，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并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的例子。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是我们

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主要谈他当时的一些想法，还特别提到林彪的“518讲话”，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看，林彪5月18日的讲话仿佛使他不满意，而其中的政变问题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谓实际情况和他的要求讲的吗？至于林彪讲的关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又违背了他的什么意愿呢？！从毛泽东希望有点个人崇拜讲，这也正是他所希望 and 要求的。林彪在这篇讲话中，说什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这些明显过头的话，毛泽东可能不够满意。但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是把林彪称作“我的朋友”，十分清楚，他并没有什么否定林彪的意思。196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把林彪“518讲话”印发全党，其批语中高度评价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很显然，若无毛泽东认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自称“钟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说什么他们（指林彪等人）要借助“钟馗”，即借助毛泽东打“鬼”；“鬼”是谁？这里没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证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泽东打倒谁。而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早有确定的目标了。这就是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 5 月 16 日通过的《通知》中所说的“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指谁？当时有人还不清楚，如张春桥 1967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戚本禹 1967 年 4 月 30 日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页注）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即在 8 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 8 月 5 日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把谜底揭开了：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而在这次全会上，形式上经过“选举”，刘少奇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们想想，我们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不是，绝对不是，没有，确实没有；如果说是、说有，谁能拿出证据？十分显然，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借助林彪——实际上，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并没说什么话（他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才到会的），也就是说“钟馗”是林彪。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为什么要借助林彪，把林彪当做“钟馗”？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从历史方面讲，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钟爱的部下，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林彪经常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林彪又能征善战，25 岁就当了解放军副军长，不论在历次反围剿中，还是在长征中，林彪率领的军队冲锋陷阵，斩关夺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战争中，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国最后的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以林彪为主指挥了两个，他率领军队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从北到南，其足迹纵贯中国，建国后授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年纪最轻，却名列第三；这是认可和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从现实方面说，林彪通过 1959 年庐山会议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在军队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置于首位，特别是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着许多人批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中央领导人中唯

独他 1 月 29 日发表讲话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赞赏，他说：“林彪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 548 页）1962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说：“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指林彪 1962 年 1 月 29 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又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1996 年版第 62 页）——这个“批示”入木三分、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心态！此后，毛泽东念念不忘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1965 年 11 月，罗瑞卿（离被打倒只剩一个月了，也许还不到一个月！）告诉毛泽东要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做三、四个小时的报告。”（《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 556 页）“七千人大会”以后，即 1962 年以后，毛泽东对林彪搞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大力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林彪不同，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到处套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等，使毛泽东很憋气，特别是在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召开的制定关于“四清”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措施的中央会议上，刘少奇和毛

泽东又公开争论“四清”运动的性质,毛、刘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使毛泽东下决心拿下刘少奇换接班人。谁能代替刘少奇做接班人?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林彪不仅懂军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刘少奇做接班人成为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这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关于林彪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本来是请假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林彪到会?无疑也是为了利用林彪。众所周知,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既然他已确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会怎么行呢?这时,毛泽东并不需要林彪做什么,他只需要林彪的一票。“圣命难违”,林彪在大连本不想来,但又不能不来。吴法宪回忆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8月8日(应为8月6日)一大早,我就派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汪东兴把林彪接到大会堂浙江厅住下,因为那里有空调。(《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594-595 页)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也说:“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载《中华儿女》1999年2月)林彪刚到,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这是破例的。如果别的地方显示着毛泽东的权势,这一次则表现了毛泽东的谦恭。——毛泽东也有“权变”之时。接着,林彪在8月12日选举中央常委时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其目的,毛泽东就是要让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

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是一个标志：毛泽东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强调要注重生产、发展经济），再到 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极左代表张春桥（并未点出名字），没料到会引起大会的震动和轰动，“揪人”之风刮得很猛，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结果林彪被毛泽东抛弃，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大致情况。

“三支两军”。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的利用。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的篇幅较大，需另文专论。

从现在已举出的事实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应该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或者说，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对象。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说过这个问题（见《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版，第 788、786、798 页）。邱会作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觉得这是孤证，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从军长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忆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总理派往空军指挥所坐镇。14 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是有我国一架飞机于 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参见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2003 年 10 月《纵横》）毛泽东对林彪出逃摔死的这种心态和反应，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只知道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

至休克过去——这件事情对他确实打击太大了。顺便说一下，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做恶梦，梦到林彪、叶群两个死鬼向她索命，吓得她睡不着觉，——毛泽东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从很多事实，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两种反应看，他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对他的认识和评论一定要避免“平面思维”和“直线思维”。

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和邱会作回忆毛泽东所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是同一个意思。邱会作在评论这句话时，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又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见《邱会作回忆录》第788、786页）。应该说，邱会作对这句话的评论很深刻，很精彩。确实如此，毛泽东对林彪（及其所谓集团的人）真是“随心所欲放手”而“按需要任意处理”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中央，除了说林彪组织“反党集团”（后又改称“反革命集团”），要“搞政变”，“抢班夺权”，“暗杀毛主席”等等，十恶不赦，事迹败露，又“叛国投敌”，葬身荒漠，死有余辜。

“林彪事件”的发生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和标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荒唐和破产，毛泽东要推脱责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替罪羊”（确切地说是：“替死鬼”，因为林彪确已成“鬼”了），就迫害干部讲，如前面说过的打倒罗瑞卿，还有打倒贺龙以及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说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泽东听了林彪的诬陷和一面之词，还说什么上海“一月夺权”（或者说：“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甚至把林彪说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总头子”，如此等等，总之，一句话，林彪在文革中坏事做绝，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在哪里？官方文书、官修党史所说的很多很多，从过去到现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从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还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对这种不实之词人们能说什么？纵观从文革开始（毛泽东说文革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我们姑依此说）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包括“九

一三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而林彪只不过是其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五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所谓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说法。

我们姑且对“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不提出疑问，但却要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就存在吗？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形成的？对这个问题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们看看官方正史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303、304 页）——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 年夏通过‘五·一三’事件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 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 年 9 月 13 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 年 9 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一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 1967 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五年），一个是在 1972 年 9 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果有、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在文革中产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产物；现在把“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列起来，甚至还要说它先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并且这样做，把伟大英明正确的毛泽东置于何地？打倒刘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国就开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

路线”)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如此说来,是毛泽东利用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还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这种逻辑的混乱,“文革定义”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将怎样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说明呢?

最后再总结几句。

修史,中国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并把它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关于怎样修党史,中共党史的第一号专家胡乔木曾说:“我们要尽量客观、求实,不抱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转引自程中原《胡乔木谈怎样研究党史》)胡乔木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他主要主笔起草的《决议》这样做了吗?严格和确切地说,他至少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他用政治“掩饰”和“扭曲”历史,用王年一的话说:“他太讲政治实用性了”。客观和实际地说,1981年这个《决议》,“历史决议”其名,“政治决议”其实,这在《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然,在《决议》中决不止这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很明白,其责任也不完全在他。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信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和兴旺发达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证,而大量事实表明,这还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关心党史和研究党史的同志、朋友仍须努力!

2011年十月 于北京市昌平区园中园

【争鸣】

对韩爱晶《清华蒯大富》中一个历史细节的勘误

李 逊

韩爱晶这本书中有几处写到上海的文革。其中第十一章第三节《帮王洪文见周总理和江青》,说:

别看王洪文后来当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元旦的时候，他到北京来想见周总理和江青，他真还找不到门呢。当年他到北京来，还是蒯大富带他去见的周恩来和江青呢！

蒯大富的回忆说，王洪文1967年去北京参加1月15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是蒯大富将他引见给周恩来等人。王洪文还将准备好的袖章给周恩来戴上。

但是，据笔者了解，王洪文1967年1月只去过一次北京，那是1967年的1月2日，他带着陈阿大等人去的。1月3日晚，张春桥在解放军报社接见了他们，之后王洪文便回了上海。整个1967年的1月，王洪文忙着夺权，没再去北京。笔者为此专门询问了当时和王洪文比较密切的戴立清，戴也说，据他所知，王洪文只在1月初，和陈阿大等去过北京；他没有王洪文在1月的其他日子又去了北京的印象。

那么，蒯大富所说的引见给周恩来的是谁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潘国平。

几年前我曾经和潘国平通过几次电话，潘国平对笔者讲起过在北京一次大会上见到周恩来并和周恩来交谈的情况。那个大会，据潘国平的回忆是在1967年1月中旬，地点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从大会时间、会场地点以及潘国平所回忆的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看，应该就是蒯大富回忆的这次大会。所以，蒯大富向周恩来引见的，应该不是王洪文，而是潘国平。

那为什么蒯大富会认为他所引见的是王洪文呢？笔者认为，可能是蒯大富误将潘国平记成了王洪文。

王洪文和潘国平，当时都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这是由“工总司”成立时的筹备会议定下的：王洪文是成立大会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是成立大会时的执行主席。“工总司”成立后，他们两人就都被看作“工总司”的负责人或司令；虽然王洪文应该是“正”司令，但“工总司”在相当一

个时期没有明确分工，更没有分正、副。潘国平与红卫兵尤其北京红卫兵关系较密切，联系较多，以至于在许多红卫兵中，名声更响的是潘国平；王洪文的声望更多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所以，当蒯大富遇见潘国平时，很可能别人给他介绍说这是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或负责人，蒯大富若干年以后的回忆，既然是“工总司”司令，那就一定是王洪文。殊不知上海的“工总司”在最初有两个“司令”。

潘国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文革中被边缘化，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九一三”】

回望“九一三”

——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

(一)

蒋 健

40年前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迄今为止尚有许多谜团未解的最大政治事件。“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比震惊，而且完全出乎事件主角——林彪所有高层“亲密战友”们的意料，尽管这些“亲密战友”们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

40年来，学界对“九一三事件”给予了很大关注。汪东兴、李德生、张耀祠、李文普、刘吉纯、康庭梓、吴德、孙一先、王海、丁盛、林豆豆、张宁、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纷纷撰写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诸如《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等领袖传记和年谱对“九一三事件”多有涉及，更有丁凯文、于南、王年一、张聂尔、胡平、余汝信、舒云、高文谦、芦笛、陈小雅、吴润生、何蜀、迟泽厚、程光、金秋、图门、高华、肖思科等海内外研究人士的众说纷纭。此外，借助因特网信息传播便利与人人皆可参与的优势，无数网友对“九一三事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京城孤魂、jhealth、白马博士、工蜂、鹤飞翔、龙德施泰特、蹒跚学步、司马清扬等网友在《强国军事纵横》等论坛上对“九一三事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然而，笔者认为，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立论，首先取决于研究者对相关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取决于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逻辑分析水平，当然也和研究者的立场和利益有关，甚至还与研究者所受的语境限制有关。

笔者还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九一三事件”这段历史，不是全部而只是有限的片段，甚至还有一些虚假的片段。历史研究人员不得不立足这些信息，但同时要超越它们的限制，去伪存真且补白。换言之，对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说，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1、引子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邱会作在与李作鹏闲聊时说：看起来是叶群这个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30年后，邱会作则认为是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797页，787页）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对林彪出逃大惑不解的黄永胜对着邱会作扯肝裂肺地吼叫了一声：“他妈的！跑什么跑？！”（黄正《将军最后的一声吼》，电子杂志《记忆》总63期，2010年11月30日）

10月26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及外交部官员到其中南海住处开会。毛泽东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察觉，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引自《亲历者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432-433页）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说：“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我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265-266页）

当年因“两次篡改周恩来指示，致使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等罪名而获刑的李作鹏，晚年经过对“九一三事件”20年的研究后，感觉到他被周恩来当作了替罪羊。李作鹏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李作鹏还推测并质疑：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792页）

做天难做二月天，做人难做周恩来！“九一三事件”给身处漩涡中心的周恩来造成的精神刺激不亚于他的任何同僚。

9月22日，周恩来亲睹林彪折戟沉沙、曝尸荒野的照片。放松之余，周恩来莫名痛哭，并对不明就里的纪登奎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5页）

难道纪登奎不懂，此时的周恩来就懂了吗？！

10月12日，周恩来陪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南方。以往周恩来坐飞机，听完专机组人员的简单汇报，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可这次他反复询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了吗？你们都是党员吗？”（李克菲、彭东海《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4页）飞行期间，当机长张瑞霭告诉周恩来专机正飞越长江时，周恩来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停，并不安地问张瑞霭：“这是长江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像呀！”这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04-405页）

此时的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反常和多疑？难道是他生怕不经意间也像林彪那样成了叛国者？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同上海市委常委谈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

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8月1-2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534页，542页）

此时的周恩来终于明白了“九一三事件”的真谛，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2、走进历史的林立衡

分析“九一三事件”的偶然性，必然要涉及到对“偶然性”做出最主要贡献的林立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发〔1971〕57号文件）中提到：“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那么，又名林豆豆的林立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1944年出生于延安，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64年春天从清华大学二年级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到北京大学后经常缺课，其间在家中自杀过一次，后因超过规定的缺课极限，在年末按学校要求办理了休学手续。休学后，她去了《空军报》，并在文革中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其间再次在家中自杀过一次。

由于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在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期间，投寄数十封匿名信给林彪一家，用恶毒下流的语句咒骂叶群和林彪，还牵扯到其他党内高官，并挑拨林立衡与父母的关系，说她不是叶群/林彪亲生的，从而使得她疑神疑鬼。林立衡不仅一度认为自己不是叶群所生，还闹出过认为自己可能是刘少奇孩子的故事。（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92页）

从林立衡以上经历，以及她1972年9月8日在空军报社小组讨论中“我有时听到林彪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的发言（高厚

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年9期），可以看出她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关系不融洽。另外，从林彪、叶群给林立衡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欢欢喜喜，坚持到底”和“热爱爸爸，服从妈妈”这些题字来看，他们曾经试图改变女儿的个性或行为方式。

不过，由于自小生长在帅府，青少年时期又逢父亲飞黄腾达，因此成年后的林立衡也表现出很强势的一面。一位知情人，同时也是“九一三事件”研究者曾告诉笔者，林豆豆在林府，叶群根本管不了她，曾无奈地称她“豆老爷”。

顺便说说严慰冰匿名信对叶群影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965年5月25日夜，叶群在与罗瑞卿谈话时让林豆豆在场，叶群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另一个是1965年12月8日下午，叶群在向刘少奇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时，请求王光美在场，因为“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对叶群的说法，局外人罗点点的评论是“令人作呕”（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74页），王光美“听了特反感”（《王光美访谈录》，378页）。她们的做法和反应就属于“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吧。

3、“九一三事件”的前戏从何时开始？

文革初期，许多中共高官政治上相继失意，这其中遭到自己子女揭发批判的并不鲜见，如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都有子女顺应毛泽东/江青的部署揭批他们的老爸。不过，像林豆豆那样通过告密直接把父母送往黄泉路的人则是绝无仅有。

那么，林豆豆的告密活动始于何时呢？

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回忆：9月2日，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笔者注：指程世清**）向毛泽东报告了“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等情况，毛泽东听后“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104-105页）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官方的林彪事件研究权威于南说：在南昌，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反映“林立衡来南昌时曾警告他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等情况，毛泽东当时听了程世清反映的情况后，进一步提高警惕并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于南《毛泽东 1971 年南巡考述》，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暨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366页）

目前，尚不清楚林豆豆当时是根据叶群/林立果的哪些言行得出“搞不好要杀头”的言论，也不清楚林豆豆除了对程世清妻子讲过这番话之外，还同其他什么人讲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豆豆在9月7日之前就对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侍卫”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讲了不少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不然的话，张清林、杨森不会在9月7日下午林豆豆正同林立果密谈时，就去向当时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的领导姜作寿（二大队长）、刘吉纯（警卫科副科长）报告，请求他们赶快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

目前，也不清楚林豆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对张清林、杨森讲叶群和林立果坏话的，更不清楚张清林、杨森是否向其他人透露过有关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林豆豆后来对人说，林立果9月7日下午告诉她，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所以他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林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林立果说，林彪已经时间无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后来林立果去了北京，林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谈话，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85-286页）

就笔者所见资料，从9月8日开始，在北戴河林彪处的工作人员陆续有张恒昌、陈占照被林豆豆“谈话”，宋德金被刘吉纯“谈话”（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年9期）；而在9月7日及之前，也就是林

豆豆与林立果的密谈结束之前，至少有张清林、杨森、姜作寿、刘吉纯、李文普与闻过林豆豆有关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说过“‘九·一三’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之类的话。（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那么其他知情者中有谁会把有关讯息向上级反映呢？

还是根据张耀祠的回忆：“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9月8日到9月12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其南巡队伍的一系列异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84-188，193-197页）

那么，毛泽东所“知道的危急情况”来自何方呢？

舒云认为林立果身边有毛泽东的耳目（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笔者大不以为然：如果林立果身边真有毛泽东的耳目，为什么12日晚“小舰队”商量“南下”这样的大事，“耳目”不往上汇报呢？事实上，无论是李伟信、程洪珍，还是江腾蛟、鲁珉，12日夜晚都没有什么异动。但令笔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当时与林豆豆确立恋爱关系才满一个月的张清林竟敢让8341部队把他的准丈母娘叶群、准小舅子林立果这两位大人物抓起来；更令笔者感觉蹊跷的是身为空军保卫部副处长且长期随卫林豆豆的杨森不仅不制止张清林的荒唐行为，而且与他合伙去告状。

按照舒云和张宁的说法，张清林还在9月12日晚上就向林豆豆提出过四条建议：“一、调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二、派人到机场破坏飞机；三、借谈话机会把林立果绑起来；四、乘早晨林彪转车，把林彪藏起来。”

（舒云《九一三事件系列人物——林彪的女婿张清林》，转引自舒云新浪博客；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235页）

而依照林豆豆的描述，9月12日夜里，张清林挥动着拳头对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老红军张宏大喊大叫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拦住，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237-250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426期，2005年4月5日）如果说林豆豆人五人六地吆喝人可以理解，毕竟她是帅府千金、中国二号人物的女儿、《空军报》的实际掌门人，可他张清林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学的干的又是医生这个职业，9月7日和12日的行为却如此乖张，由不得笔者不起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常行为？

不过，9月7日安然度过。林豆豆、张清林和杨森的这些举动，不仅难免当时就被李文普、姜作寿们嗤之以鼻，而且增加了让他们接受林豆豆“九一三事件”前夕告密的难度。

4、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有多可靠？

《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最早由《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一书披露，目前在因特网上随处可见。该材料着重讲述了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领导以及北京的张耀祠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详细过程。

根据余汝信的说法，他在2006年3月访问林豆豆时，林豆豆向他证实该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林豆豆承认《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是她当年写的，但流传出来的渠道不得而知。（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转自《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25页，62页）

余汝信认为，关于“九一三事件”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

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同上，55页）芦笛对比了林豆豆、李文普、张耀祠、汪东兴的回忆材料后，认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林豆豆讲的才是真话”，而且“这是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如果她虚构了张宏和张耀祠的言行，立即就会被戳穿。”（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2008年5月10日改定稿，原载《海纳百川》网《罕见奇谈》论坛）

那么，林豆豆的这个材料究竟有多可靠？

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林豆豆向余汝信承认的“当年”是哪一年，因为在汉语中，“当年”中的“当”有两种读音，读“dàng”时，“当年”是指同一年；读“dāng”时，“当年”是指过去的某段时间。如果是前者，显然有误，因为当（dàng）年是1971年，而林豆豆的材料中提到了她1972年8月26日同周恩来的一次面谈；如果是后者，则只能是1972年8月26日后的某个时间。

其次，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林豆豆本人曾经说过，她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当年逼供出来的档案材料”（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也就是说，林豆豆在1972年8月27日到1976年10月6日这个时间段写的材料，有可能因为谢静宜的插手，并不可靠，虽然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她已被解除审查。而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并不存在林豆豆还受审查的事实，所以也不会有“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

又次，还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谢静宜1988年当面向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小霖断然否认了关于她有意篡改林豆豆所写材料的说法。林小霖则说过：“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也就是说，林豆豆的诚实性大可置疑。

再者，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当年”说法并非唯一，最为著名的是她写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

社，1988年，270-273页）。笔者在这里再举两例：一个是1988年她对罗瑞卿女儿罗点点讲的，“豆豆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九十六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笔者注：林立果小名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我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九十六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直到她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分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预防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堵死，或者砍一棵大树把路堵死。先让警卫部队把联峰山的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85-286页）

另一个说法源自1996年10月11日林豆豆接受的舒云采访：“我们那样急切地五次报告和请求受到了怎样的对待？！这些事实统统被谎言所掩盖和抹杀了！周恩来在我第一次找八三四一部队后就迅速采取了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拦阻措施。按照惯例，林彪上飞机前，八三四一部队派人和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措施，先上飞机检查，然后武装守卫飞机，在舷梯两边保护林彪登机。最后还要派警卫干部和战士同机跟随，并派部队乘另一架飞机护送。但奇怪的是，这次周恩来采取的保证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完全负有专门责任的八三四一部队有关领导始终不执行！我们第五次请求采取紧急措施后约莫30多分钟，林彪飞机‘顺利’

起飞了。”（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转自《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407页）

最后一点，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点，《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张聂尔对此的态度是：“我不能证实或推翻她的观点，因为一切尚需要旁证。”（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http://club.dayoo.com/view-102219-1-1.html>）

同样的道理，笔者认为，《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只是林豆豆本人现在认可的材料，其是否可靠尚需要旁证。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多少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叙述和辩白。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写法是人性使然，因为人们对曾经历过的闹心事，为摆脱懊悔和负罪感的长期煎熬，求得心灵的安宁，就需要给自己当初的行为做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如果当事人有意地逃避自我责任，长此以往就会自我蒙蔽，就会把虚妄当作事实，就会自欺且欺人。就林豆豆而言，正是她当年的告密导致她至亲的父母和弟弟走上黄泉路，所以她更有逃避自我责任的心理需求，所以她宁愿把发生“九一三事件”的责任推给李文普、推给张宏、推给张耀祠、推给周恩来、推给“中央”。

还需要一提的是，伪造历史不仅可以通过虚构某些情节来实现，更可以依靠有意遗漏某些关键情节来达到，而且后者更巧妙、更不易被人发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就遗漏了林豆豆向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过的林立果从上海带来一只敢死队、林立果会派飞机轰炸天安门的关键情节，且不说材料中比比皆是的“无心之失”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研究者应当分析和识别当事人回忆中的这些“陷阱”，更要留意那些无心之失。

另外，历史进程是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演变的，每个当事人通常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上目睹这个进程，所以他/她的视野肯定是有限的。这就好比一个井底之蛙，它看到的天既和它所在井的位置有关，也和该井的深浅和大小有关，更

和它看天的时间段有关。简单地说，无论什么时间，这个井底之蛙所看到的天只会是天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必须采集尽可能多的井底之蛙所观察到的“天象”信息。

欲破解“九一三事件”之谜，也当如是处理。

5、林豆豆到底凭什么去告密？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和林豆豆母亲的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吕学文《亲历林彪的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10期）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南方巡视，大挖林彪的墙脚；林豆豆则在叶群眼皮底下大挖叶群的墙脚，可叶群却浑然不觉。林办的一些人尽管听到了林豆豆的一些“无度言谈”，但没有一个人遵守“纪律”向叶群报告，难道是恪守疏不间亲的古训？

1971年9月12日是中国政坛风云诡谲的一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豆豆在北戴河开始告密行动。

李文普回忆：“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当时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

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 96 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晚上，北戴河畔风云骤起，但谁也弄不清风从何来？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 2 期）

林豆豆从李文普那里走了，“九一三事件”的大幕由是拉开。

尽管《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被林豆豆本人认可、被余汝信认为是“可靠的依据”、被芦笛认为是“真话”，但笔者觉得它有问题。

林豆豆回忆：

已经晚上 9 点 50 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 58 号楼的 8341 部队二大队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我还告诉他：“……今天晚上 8 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后，机场曾打电话向‘林办’询问，首长和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林立果已经回来了，叶群可能也不知道林立果什么时候回来，以至没有事先派车去接他，林立果是开机场的车回来的，现在那架飞机还停在山海关机场。”……我见张宏副团长……说得这样有把握，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此处林豆豆把姜作寿的职务从“大队长”误记成“副大队长”。

看完“井蛙”林豆豆的回忆，我们再看“井蛙”刘吉纯的回忆，这两个“井蛙”一度在同一个“井”里。

刘吉纯回忆：

当晚 10 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

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报告去，李文普说怕林、叶找他，他不去。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和陆军医，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我回到 96 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因为曾经在同一个“井”里，所以两个“井蛙”都回忆是在房子外面谈的。但林豆豆说刘吉纯是陪张宏、姜作寿一起来的，且参加了谈话，最后同她一起回去的，而且是从大队部走的，言外之意是她同张宏、姜作寿的谈话是在大队部结束的；刘吉纯则根本没提到张宏，还说他没参与林豆豆同姜作寿的谈话，而且是自己回去的。

林豆豆、刘吉纯和姜作寿这三个“井蛙”一度在同一个“井”里。再看姜作寿的回忆：

那晚十点多钟，我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工夫，刘吉纯副科长领着林立衡来找我。……在屋外的小树林里，她说出了让我很惊讶的情况：“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说。“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像林彪这样的高级领导人，怎么能跟着老婆、孩子去香港呢？那个时候人们的印象中香港无异于国民党敌占区呀！但我又不

能讲出来。我问她：“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听得出，林立衡并不怀疑林彪有什么问题。“这，我要报告。”我讲出了办法。“向谁报告？”“向张耀祠、汪东兴报告。”“他们靠得住吗？”她疑虑重重地问。“靠得住。”我着意向她说明，他们都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为使她相信，我还说：“我不向他们报告还向谁报告呢？”“这么说，不报他们还不行。”她迟疑片刻之后才说：“那好吧，你就赶快去报告吧！”……我回到值班室，便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我们的团长张耀祠作了报告……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15-316页)

和刘吉纯一样，姜作寿也说谈话是在“小树林”进行的，也没说谈话时张宏在场。

看起来，发生记忆错误的是林豆豆。

不过，远在北京的“井蛙”汪东兴的回忆却同林豆豆的一致。

汪东兴回忆：

林立衡听到这些话（笔者注：指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密谈），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笔者注：应为10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3页）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再看“井蛙”张耀祠的回忆，当夜他很长时间和汪东兴坐在同一个“井”里。

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甫(笔者注：李文甫)，要他立即向 8341 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甫说：“我离不开。”林立衡只好在晚上 9 点 50 分左右，到 8341 部队找到二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姜作寿说：“我们张宏副团长在这里，我找他来。”林立衡说：“请他快点来。”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 10 点 20 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7-108 页)

张耀祠说的很不细，但有一点很明白，张宏确实不是和姜作寿一起出现在林豆豆面前的。

那么“井蛙”张宏是什么时间和谁一起听的林豆豆的告密呢？

可惜，笔者没见到张宏关于此事留下的任何只言片语。

万幸的是，另一个“井蛙”，肖奇明，弥补了这个缺憾。肖奇明时任林彪警卫中队中队长，也是对“九一三事件”偶然性发生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当夜很长时间和张宏坐在同一个“井”里。《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有四处提到了肖奇明，且显然是当年林豆豆眼中的正面人物。当然在肖奇明的笔下，林豆豆也是正面人物。

肖奇明回忆：

海滨的夜晚十分宁静，22 点 20 分，我正准备休息时，副大队长于仁堂匆匆忙忙跑到我宿舍说：“老肖，赶快到大队部值班室去，豆豆（指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我们反映。”22 点 30 分左右，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

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来到大队值班室。不一会儿，林立衡又打来电话，叫我们去 55 楼前。55 楼东边有一小片松树林，林中阴暗而寂静……。当我们快步走入林中，只见林立衡早已在那里等我们。……她略带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叶群逼着我与张清林今晚结婚，我没有同意，后来改为订婚。”接着她又告诉我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暗害毛主席，我爸爸（指林彪）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叶群和林立果的。今天他们打算坐飞机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在机场他们还准备了敢死队，你们要有防备，要把飞机控制起来，不能让它起飞。”说完她问张宏同志怎么办？张宏同志告诉她说：“马上向中央报告。”她又问：“报告给谁？”张宏同志说：“向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报告。”她说：“张副主任是不是张耀祠？”张说：“是的。”她表示同意先向张耀祠同志报告，然后林豆豆就回到 96 楼去了。我们回到大队部值班室后，张宏同志马上把林立衡说的情况用保密电话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耀祠同志，张副主任了解情况后，在电话中强调说：“部队要做好准备，有新的情况及时报告。”（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 年 7 期，49 页）

需要一提的是，当时林彪夫妇住在北戴河东联峰山下莲花石旁的 96 楼，96 楼往南，通过一条环状小路，有一条直通海滨的马路，马路两边有两座小楼，东侧的 56 楼归林豆豆使用，西侧的 57 楼属林立果使用；再往南，临近西路口处也有两座小楼，东侧的 55 楼是警卫部队的住处，西侧的 58 楼是警卫部队队部办公处，也是部队领导的住处，肖奇明就住在该楼。

姜作寿、张宏、肖奇明们选择在 55 楼东边的松树林同林豆豆见面，显然是为了她的安全和方便，因为 55 楼与林豆豆所住的 56 楼都在马路的东侧。

综合各个“井蛙”看到的“天”，笔者认为“完整的天”应该是这样的：晚 9 点 50 分，林豆豆和刘吉纯与李文普分手，离开 96 楼，跑步去告密；10 点刚过，到达北戴河 8341 部队驻地，此时干部战士已经休息，为了安全

和保密，刘吉纯让林豆豆到 55 楼东边的松树林去等，他去 58 楼的部队值班室找人；

10 点 10 分，刘吉纯陪姜作寿到松树林来见林豆豆，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豆豆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

稍后，“看看动静”见无事的刘吉纯独自回 96 楼了，毕竟他是林彪的警卫人员；

10 点 15 分左右，林豆豆和姜作寿的谈话结束，林豆豆求见张宏；

稍后，姜作寿就近到 55 楼打电话给张宏，报告林豆豆的“告密”和她的求见，张宏指示姜作寿向北京报告，并通知于仁堂召集有关人员来大队部值班室开会；

10 点 20 分，姜作寿向北京的张耀祠报告：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带着林彪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林豆豆还说是叶群亲自给她布置的。张耀祠马上指示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张耀祠随后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马上用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汪东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10 点 30 分左右，接完汪东兴/张耀祠转达的周恩来指示的电话后，张宏来到大队值班室，稍后接到姜作寿打来的电话，林豆豆要求还是在 55 楼东边的松树林见面；随后，张宏率于仁堂和肖奇明到松树林听取林豆豆的密报；

10 点 40 分左右，林豆豆返回，张宏则回到 58 楼马上向北京的汪东兴/张耀祠报告：林豆豆说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随即报告周恩来山海关已经停有专机。（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4 页）

于是，“九一三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对“九一三事件”偶然性发生做出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正式登场，他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全心全意处理林豆豆当夜密报的事情。

说起来可笑又可悲的是，林豆豆通过姜作寿传上来的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到香港的密报并无什么真凭实据，基本上是她这个心智不健全的人的臆想。

因而 20 多年后，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不愿意提林豆豆这个密报的内容，而

是以“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林彪要去外地”含糊之。不过，汪东兴确实承认了“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3页，206页）

那么，林豆豆凭什么去告的密呢，又凭什么让别人相信她的呢？林豆豆向张宏讲了林立果当晚对他说的“马上去广州”的话，还讲了林彪卫生员当晚听见叶群跟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的话。（《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林豆豆告诉姜作寿“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张聂尔《风云“九一三”》，315页）。

显然，林豆豆对姜作寿撒了谎，因为叶群根本不可能对她讲“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话。

那么，林豆豆果真是当晚听了林立果和林彪卫生员的话之后，才得出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先到广州再逃到香港”的推论吗？

不是！

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他在平台上乘凉时，林豆豆突然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但林豆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林豆豆自己也承认：“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而9月12日下午，林豆豆同李文普谈话的那个时间段，北戴河没有任何人，包括叶群，知道林立果当晚回来。

在更早的9月7日的晚上，林豆豆就告诉刘吉纯：“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

地去。”（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真不知道那时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哪些坏事被上边知道了，林豆豆又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即使林立果真的在9月7日下午对林豆豆讲了他计划干的一些“坏事”（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193-194页），也不代表他能提前好几天就告诉林豆豆他会在机场准备了一支敢死队啊。

林豆豆对张宏说“林立果讲他在东山有个秘密机场，可以监听全国的电话，包括这里通往北京的电话”（《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确实糊弄不了张宏，因为他完全知道底细。

但林豆豆对张宏说林立果在机场还准备了敢死队，一定让张宏费踌躇，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底细。

大约一个小时后，林豆豆又对张宏说林立果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这下子就不只是北戴河的张宏费踌躇的问题了，就连北京的张耀祠、汪东兴、周恩来，甚至毛泽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说起来更可笑又更可悲的是，“中央”对林豆豆的种种密报，有个从不敢信到半信半疑再到不敢不信的演变过程，最终连一向自负的毛泽东也于9月13日凌晨三点多钟从中南海跑到人民大会堂避难去了，而那时林彪已经在蒙古大漠灰飞烟灭了。

本来林立果策划的南下去广州是为了“另立中央”，而不是为了“逃到香港”，但林豆豆一个接一个的假情报，促使“中央”行动起来，结果歪打正着。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就是如此诡异！

6、究竟是胡萍还是吴法宪没有说实话？

胡萍生前对舒云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

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舒云《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引自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f?kz=735406552>）

胡萍 2008 年 4 月去世，但他的儿子继续为其父亲鸣冤叫屈：“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胡耀萍《我的父亲胡萍》，《老照片》76 辑，2011 年 4 月）

但问题是，“913 事件”前夕，吴法宪追查 256 专机去山海关的原因时，胡萍为什么串通潘景寅骗吴法宪说是潘景寅自行安排的试航呢？直接对吴法宪说专机是林立果坐去的不行吗？叶群后来不就是这样对周恩来的吗？而且当吴法宪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让 256 专机空飞回京，胡萍为什么又与潘景寅合谋骗吴法宪说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呢？（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 页）

如果胡萍起初就如实告诉吴法宪 256 专机是林立果坐去的，是我按照你的指示和惯例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又能说什么呢？况且林立果很容易找个堂皇的理由，比如说去北戴河面贺姐姐林豆豆订婚。

胡萍的说法，不仅当时就给林立果和周宇驰帮了倒忙，而且后来也使他说不清楚。笔者认为，胡萍晚年的悲惨遭遇固然令人唏嘘，但他当夜的言行确实匪夷所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吴法宪当年是否有过胡萍父子都强调有的那个“指示”呢？此外，“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指的“飞机”是指接人和送文件的普通飞机，还是林彪的专机呢？如果是后者，吴法宪怎么会、怎么敢大撒手呢？胡萍当夜又怎么会对吴法宪隐瞒它的真实行踪呢？而吴法宪回忆，“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吴法宪回忆录》，862 页），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如何，胡萍都不能自圆其说，而吴法宪的做法顺理成章。

胡萍的这些话自然让当时已经知道林立果坐 256 专机去了北戴河的周恩来

不会相信，害得叶群随后不得不亲自出面替他“擦屁股”。

7、林豆豆为什么又去告密？

告密后的林豆豆回去了吗？

带着林豆豆去告密的刘吉纯说他“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汪东兴说：“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6页）

吕学文说：“林立衡要求姜大队长把她藏起来，并进行严格保密，决不能让叶群他们知道她来过这里。”“姜大队长接到北京指示后，立即叫来中队长肖启明（笔者注：应为肖奇明），和他一起召开了有关人员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并保证其安全的事宜；一方面命令警卫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吕学文《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

不过，“井蛙”汪东兴把林豆豆第二次告密后的要求错记成第一次告密后的事情了；“井蛙”吕学文的嘴太大了，那个时候姜作寿、肖奇明怎么敢命令“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呢？

当事人林豆豆自己则说她“放心地……返回林彪住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目击者肖奇明说：“她表示同意先向张耀祠同志报告，然后林豆豆就回到96楼去了。随后，张宏同志叫我通知区队以上干部到大队部开会。大约10分钟左右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姜大队长说：‘今晚有情况，要做好准备。’并当场决定由副大队长于仁堂和一区队长黄树忠带领10名战士到机场去观察动静。如果情况属实马上把飞机扣起来，不许起飞，请示中央如何处理。会后，区队干部各自回去做行动准备，大队长亲自去96楼观察动静。值班室里只剩下张副团长和我。”（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

不过，另一个“井蛙”，当事人于仁堂则说：“张副团长向北京报告后，向我们布置：‘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情况，及时报告，不要轻易行动。’以后，姜大队长派我到96楼周围观察情况。这时大约晚上11点，我到96楼外看了看，没有什么动静。秘书办公室里，只有宋秘书和林彪的医生坐着看东西，走廊里好像有放电影的声音。过了大约15分钟，姜大队长也上来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281-282页）

在第一时间接到姜作寿报告的张耀祠曾经指示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不过，哪个“专人”，不管是于仁堂还是姜作寿，能起到的作用都不会比林豆豆这个“内应”要大，因此尽管有刘吉纯的“嘱咐”，姜作寿还是没有“隐藏”林豆豆，况且此时林豆豆并没要求“把她藏起来”。

林豆豆回到96楼后，还去见了叶群，叶群通知她，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她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随后林豆豆又从李文普那里了解到林彪“同平常一样，11点就上床睡觉了。”（《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周恩来查问256专机的事情，通过林豆豆→张宏→张耀祠→汪东兴→周恩来→吴法宪→胡萍→周宇驰→林立果这条线，传到了叶群这里。

不明就里的叶群马上命令李文普：“立即安排去广州！”林豆豆说，稍后“我刚走进叶群住处的走廊，叶群就出现在电影银幕前宣布停放电影，叫我和张清林、张宁马上拿行李去机场，让工作人员也一起走。”于是，林豆豆决定马上离开96号楼再次去向张宏告密。

林豆豆回忆：

在门口见到姜副大队长时因有其他人不便说话，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用目光示意他要守好林彪的大门，他点头会意，并调了一辆车让我快上。我叫张清林留在我们住的56号楼应付林立果，让杨森和我一起去大队部。（笔者注：96楼离58楼的距离可不近，单是96楼距56楼就有400多米远，可有了姜作寿调来的汽车，那点距离真不算什么，所以）车子很快开到大队部，但大队部值班室空无一人。杨森立即去找张宏，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张宏

找来。我告诉张宏：“李处长和姜副大队长叫你赶快到 96 号楼去。”并请他立即命令部队封锁通往山海关机场的道路。奇怪的是，当我反复讲这些话时，张宏虽然满口答应，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后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我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张宏看着我，一声不吭。（《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难道林豆豆的第二次告密只说了这些吗？

不是！

笔者前面说过，“伪造历史不仅可以通过虚构某些情节来实现，更可以依靠有意遗漏某些关键情节来达到，而且后者更巧妙、更不易被人发现。”

请看张耀祠的回忆：

晚上 11 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了上述情况。（《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 页）

当晚“逃跑”，是叶群在电影银幕前公开宣布的，实在算不得什么秘密，而“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则是骇人听闻的。

不过，单从张耀祠的回忆来看，林豆豆这个骇人听闻的告密是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前，此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证实林豆豆的告密言之有据，所以张耀祠所做的只是“又给张宏同志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张耀祠回

忆毛泽东》，109页）

再看肖奇明的回忆：

23点40分左右，林立衡和她未婚夫张清林匆匆忙忙从96楼跑到58楼，正好遇到我。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他们（指叶群、林立果）要我回56楼准备自己的东西马上走。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同时，林立衡担心他们强迫她一起走，要求我们予以保护。……我请她跟我一起去大队部值班室去找领导。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到飞机场先把飞机控制起来，不能起飞。”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同志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

综合林、张、肖三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张耀祠当时的处置并无任何不当，况且事后也证明，“林立果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和“林立果在机场有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的密报纯粹是林豆豆的臆造。

当然，肖奇明的回忆存在“无心之失”，比如他说林豆豆是和张清林一起来报告的，而林豆豆说她是和杨森一起来的，张清林离开96楼后去56楼了。林豆豆的这个说法分别得到张耀祠和李文普回忆的支持，但李文普把林豆豆第二次告密的时间和同行人与第一次告密搞混了，所以误记成林豆豆“带着杨森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96楼看电影。”（《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

得不说》)

还有肖奇明说的“23点40分左右”不准确，林豆豆回忆她在大队部准备与北京的张耀祠通话时无意间听到军委总机话务员正在为叶群挂电话，“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在1972年8月26日见到我时告诉我，叶群打电话说他们要请假去广州”（《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23点17分左右，“左右”不超过三分钟。

实际上，张耀祠说“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的回忆也太过粗线条。笔者认为，林豆豆关于“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和林立果、叶群“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的报告并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成的，前者发生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前，后者发生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后，虽然二者的确都发生在“晚上11点多钟”。

历史研究决不能“宜粗不宜细”，特别是对“九一三事件”这样的复杂历史，很多因果关系搞不清，这或多或少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方针有关，政治先行而罔顾细节。

笔者井见所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研究者，都没能提供完整或准确的“九一三事件”时间表，且很多是以讹传讹。而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就是“九一三事件”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3点22分。

8、叶群与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周恩来年谱》记载：23时半，周恩来与叶群通电话，叶称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周恩来年谱》，481页）

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主动打的电话呢？当年的“大人物”们对此各执一词：汪东兴、李作鹏和郭玉峰回忆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5页；《李作鹏回忆录》，698页；阎晶明《我

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55页）；张耀祠、吴法宪、邱会作回忆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页；《吴法宪回忆录》，862页；《邱会作回忆录》，793页）；李德生的两个回忆自相矛盾，一个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李德生回忆录》，418页），另一个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页）。但肖奇明、高振普和李志绥这三个“小人物”的有关回忆都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63页；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文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514页）。林豆豆也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担任过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六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陈扬勇认为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6年，7页）；而于南早先著文说是“周恩来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叶群”（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页），后又更正为“叶群……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周恩来”（江明武《周恩来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935页）。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年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的座谈记录整理稿上记载的是“11时22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

关于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内容，汪东兴的说法如下：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

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5-206页）

李德生的说法几乎就是汪东兴说法的翻版。（《李德生回忆录》，418页）

张耀祠的说法则与汪东兴有很大不同。张耀祠回忆：

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叶群说：“是空中。”总理问：“有飞机吗？”叶群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110页）

几乎所有海内外研究者，比如张聂尔（《风云“九一三”》，291-292页）、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京城孤魂（《“九一三”全景回放》，《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0年9月12日）、

丁凯文（《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548期，2007年1月2日），都接受了汪东兴的说法。如果说他们之间有所不同的话，只不过是有的突出周恩来的“机智”，旁敲侧击，敲山震虎；有的则强调叶群的“愚蠢”，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笔者认为，张耀祠的说法更接近实情，更符合当夜的事态演变。近几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直接或间接印证了张耀祠的说法。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在9月13日早晨向在京的全部政治局委员介绍了林彪座机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座机已经坠毁。邱会作的说法如下：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周总理接着说：“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一〇一（笔者注：指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笔者注：吴法宪也说是去大连，见《吴法宪回忆录》862页），但林豆豆说是去广州，见《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周总理接着说：“十一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林彪随身带的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邱会作回忆录》，793页）

从张耀祠和邱会作的回忆看，叶群并没有对周恩来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

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而是坚持晚上飞，并说是林彪的主意。这个事实从周恩来随后打给吴法宪和李作鹏的电话中得到验证。

9、周恩来凭什么断定北戴河那里有问题？

丁凯文认为，“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丁凯文《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

笔者认为，说叶群在打电话给周恩来时就已经决定“逃亡”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境。虽然林豆豆已通过北戴河 8341 部队陆续上报“林立果已调专机计划逃到香港”、“今夜就走”、“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中南海”的密息，但此时反馈到叶群那里的消息只是周恩来/吴法宪查专机，因此叶群决定用林彪的名头压一下周恩来，而且挑明了是“夜里走，天上动”。笔者还认为，叶群此刻预想的目的地还是广州，否则她不会“让工作人员也一起走”，更不会在与周恩来通话后还让吴法宪调飞机来。

不过，张耀祠认为：“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张耀祠回忆录》）而且“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人说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22页）

笔者认为张耀祠和周恩来的这些说法未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严格来说，叶群确实还没有调动飞机，256专机确实是林立果当晚坐来的，而且林家子女及其随从当时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北戴河之间确实是平常之事。此外，林彪出行一架专机确实不够。况且，叶群确实如周恩来预料的那样，随后确实向吴法宪调飞机了。

不过，笔者还认为叶群的电话不仅没有消除甚或加剧了周恩来/吴法宪因胡萍“潘景寅自主试飞，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出现故障”之类谎话引起的怀疑。

吴法宪回忆：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

接完吴法宪的电话后，周恩来随即用电话指示李作鹏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没有交代任何背景。

李作鹏回忆周恩来向他做的四点指示是：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李作鹏回忆录》，694页）

高文谦认为，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

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自己不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夜航不安全，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周恩来去电话。（《晚年周恩来》）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蒙冤入狱十多年的李作鹏老将军对周恩来的做法无法理解，他直言：

周总理大约是 12 日 23 点 15 分左右，在电话中对我做的四条指示。而 23 点 30 分周总理才给叶群打电话，此时的林彪、叶群并没有离开北戴河驻地。为什么周总理不直接与林彪通话力劝不要夜航，反而先于叶群，在电话中对我说：“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不在北戴河驻地与林、叶直接通话，而舍近求远地要到机场让别人传话后与林彪通话，如果汪东兴反复说的周总理与叶群通话时间是正确的，总理这样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无法理解！（《李作鹏回忆录》，789 页）

不过，李作鹏这里首先是把周恩来给他电话的时间记错了、记早了，其次汪东兴说的周、叶通话时间和受话方并不正确。笔者前面提到，周、叶通话时间是在 23 点 22 分，而且是叶打给周。随后又有周打给吴法宪、叶打给吴法宪、吴法宪又打给周这三个电话，因此周给他的电话绝对不可能在 23 点 28 分之前，所以李作鹏对周的某些不满只能说是误解。

其实，周恩来有他周恩来的难处。1970 年 8 月，庐山会议前的一天，周恩来亲笔抄下“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样的字句。（《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138-139 页）那时“种菜哥哥”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们，“采桑娘子”是康生、江青、张春桥们；而此时“种菜哥哥”是林彪，“采桑娘子”则是毛泽东。“种菜哥哥”他惹不起，“采桑娘子”他更惹不起。周恩来此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和底牌，而毛泽东回京前没有通知他，回京后也没有召见他，所以对他来说，此刻最重要也最紧迫的

事情就是马上去见毛泽东。

因而笔者认为，周恩来那个可操作性很差的“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的指示的要义是“以拖应变”，他要拖出时间去见毛泽东。

10、毛泽东何时与闻？

《毛泽东传》说：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 118 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1601-1602 页）

迄今为止，官方研究的主流观点基本认为毛泽东是在林彪飞机强行升空后才了解当夜发生的事情，此前一直由周恩来自主行事，甚至有研究者认为：“9 月 12 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推到一个历史高点。”（李洁非《1972：国家与革命》，《钟山》，2010 年 5 期）

而高文谦推断：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兴灾乐祸（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部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晚年周恩来》，343 页）

芦笛也推断：汪东兴和张耀祠都强调，周是在林彪飞机已经起飞后才报告毛的，绝对是别有用心的谎言。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终都是最终决策者，周恩来不过是个忠实执行人而已。（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笔者也曾经顺着林豆豆警告程世清夫人→9月2日程世清向毛泽东密报→9月7日北戴河张清林、杨森要求抓叶群、林立果闹剧→9月12日夜林豆豆一系列密报→9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对林豆豆的表扬→1973年1月9日林豆豆的自我表扬“‘九·一三’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这个链条，探讨过北戴河的情报上达天听的途径。（吉祥健康《说不清的913,道不尽的101》，《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0年5月27日）

还有很多文章，尤其是网文，根据常识和逻辑，猜测当林豆豆的密报传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张耀祠在报告周恩来的同时也一定报告了毛泽东。

不过，包括笔者在内的这些分析和猜测目前并没有得到什么证据支持。

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互动始于何时呢？

高文谦认为：直到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才紧急行动起来。他立刻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并采取了应变措施：指派李德生和纪登奎分别坐镇空军司令部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随后，他又驱车赶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晚年周恩来》）

于南认为周恩来是在256专机强行起飞后，才从人民大会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的。（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3页）于南还认为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报告之前，已经把李德生派往空军司令部。（同上，375页）

陈扬勇认为周恩来把李德生派往空军司令部之后，才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而256专机强行起飞是周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生的事情。（《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8页）

笔者则认为，依据周恩来的权限和行事风格，不可能在统帅毛泽东授权之前，随便插手军队高层的事情，何况周恩来这时要应对的是叶群背后的副统帅林彪。

而且派往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的人必须是毛泽东中意之人，不然会弄巧成拙。此外，李德生在当天下午才被毛泽东召见且被单独赋予特殊使命，这个情况周恩来当时并不知道。

因此笔者认为，周恩来在给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和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694页）下达有关指示后，就亲自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是毛泽东当面指示周恩来可以派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派纪登奎坐镇北空司令部，当周恩来从中南海返回人民大会堂后便着手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李德生回忆说：“周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立即派我到空军作战室……”（《李德生回忆录》，419页）但周与叶群通话时，李德生并不在场，所以他说的“立即”到底是隔了多长时间呢？李德生还回忆说：“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李德生回忆录》，416页）由于周与叶群的通话大约在11点24分结束，因此可以判定周恩来是在半个多小时后才召见李德生的，此时周已经从中南海见完毛泽东回来。

时任李德生秘书、后来当过《解放军报》社长并参与过《李德生回忆录》写作的祝庭勋将军的说法是：刚过午夜12点，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李德生说：“现已查明，有一架空军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林彪要乘这架飞机逃跑。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你的任务是立即到空军指挥室，代替我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李德生马上明白了，毛泽东担心的事，已经发生。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指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94-195页）

请注意“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等用语。

李德生进入作战值班室，已是13日凌晨零点以后。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他们满腹狐疑，不知道总政治部主任为什么半夜来到空军机关。……李德生告诉曹里怀：“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

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网站的信息直接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标图板上，跟踪记录着三叉戟 256 号的航行轨迹。（《李德生在动乱岁月》，203-204 页）

零时 40 分，在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 8 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舒云《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2004 年 12 期）

从曹里怀、白云的“满腹狐疑”看，李德生人先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后到。从这个时间看，高文谦的说法明显不成立，何况当时毛泽东的卧房没有电话（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 页），周恩来不可能大半夜地让毛泽东屈尊到几十米外的办公室去接电话。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报告毛泽东的呢？

时任毛泽东警卫队中队长陈长江的说法是：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上飞机，并保护她的安全。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不到 10 分钟，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汪东兴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空军、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请他报告毛主席。（陈长江/文，舒云/整理《“九一三”前后，我为毛主席站岗》，《同舟共进》，2009 年 7 期）

不过，陈长江并没有给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的具体时间，而这对于破解“九一三事件”谜局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在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全过程中与周恩来形影不离的卫士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71 页）的回忆，在与叶群通话并命令李作鹏控制 256 专机后，周恩来把开会的会场由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改为新疆厅，并对与会人员说，有件事先去处理一下，请同志们等一等。然后，周恩来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泽东报告当天发生的一切。（《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3 页）

综合李作鹏和张耀祠的回忆来看，周恩来到达中南海游泳池的具体时间肯定是在 12 日 23 点 40 分之后，因为张耀祠回忆说：“是夜 23 点 40 分，……还没有报告毛主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0 页）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了什么呢？

自称在现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说：“周十一点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听着。周恩来向毛报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密报给北戴河的张宏，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叶群刚才打电话给周，说林彪要移动一下，但是说没有飞机。但周查了空军，有一架三叉战斗机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关机场。因此周怀疑叶群这是声东击西法，用来掩饰他们的潜逃。这些都说明情况有变。毛一听到周说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但他随即表情自若，静听周的报告，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周建议，毛还是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们计划政变，可能随时会爆发武装攻击。看样子，人民大会堂比较安全，容易防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4 页）

李志绥的回忆错讹不少，但有一点很清楚，周恩来是在他与叶群通话之后、林彪在北戴河动身之前来见毛泽东的，而且此前毛泽东并未与闻林豆豆的密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4-515 页），这与张耀祠的回忆吻合。因此可以说，高文谦提出的“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的推断不确。

不过，笔者认为，要言不烦，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一定会讲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这四个人是靠得住的，你可以放心使用，我下午才召见过他们……

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期间，“九一三事件”的大戏进入了高潮！

11、叶群为什么惶恐？

周恩来 1972 年 8 月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以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林彪)会跑，因盘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提心吊胆，逃跑了。（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5 页）

汪东兴认为，“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5页）

中国大陆的官方研究者几乎都持与汪东兴类似的观点。

不过，正如笔者前面指出的那样，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之前就已经决定连夜走，怎么会因为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就慌了呢？周恩来到北戴河扑个空对叶群的夜行又有什么影响呢？

高文谦则认为：“叶群听说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后，立刻慌了神，她给北京打电话又到处找不到黄永胜。其实，黄永胜此时已被周以‘协助处理’此事为名，留在身边，动弹不得。这样一来，叶群感到大祸临头，认为毛泽东已经在北京动手，否则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不会下令扣押林彪的专机，而周又在深更半夜突然提出要来北戴河‘看望’林彪，那不过是奉毛之命前来抓人的托辞而已。一种末日来临的气氛笼罩着北戴河林彪住地。”（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的这个说法有意无意间落入黄、吴、李、邱参与“两谋”的窠臼，但知悉内情的叶群怎么会认为毛泽东已经在北京动手抓了黄永胜呢？何况，结束与周恩来通话后的叶群马上联系上了吴法宪，当时问题比黄永胜严重的吴法宪尚且无事，遑论黄永胜呢？

近年来大作频出的舒云则推测：“叶群在最后半小时干了些什么？一般说，1971年9月12日夜，是叶群接到周恩来电话，才改变第二天早上6点走的决定，连夜出逃的。实际上叶群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还‘安静’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叶群在干什么？无人回答。周恩来的警卫披露，周恩来在接到张耀祠报告后，特意回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叫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许离开，也不许接电话。周恩来出来后布置警卫严密封锁新疆厅，不许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许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谁？有黄永胜。叶群得知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又得知北京封了飞机，按常理她会想到问问黄永胜，看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却找不到黄永胜了！办公室没有，家里也没有，哪里也没有。黄永胜怎么可能找不到？于是叶群认为黄永胜被抓起来了，她才临时决定连夜走，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大叫快走，有人来抓你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525页）

但是，舒云在这里只有大胆的假设，不见小心的求证。事实上，“周恩来在接到张耀祠报告后，特意回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的时间已过9月13日零点，那时叶群和林彪已经在向山海关狂奔的路上(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4页)；而“周恩来出来后布置警卫严密封锁新疆厅，不许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许里面的人出来”时林彪的专机已经飞越国境线(同上，165页)。其实，周恩来将黄永胜以“协助处理”为名留在身边是他从中南海毛泽东处回来以后的事情，此前黄永胜的行动是自由的。

芦笛对舒云及其作品有个精辟的概括：“舒云调查报告含有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缺陷是她缺乏专业训练，常在访谈录中‘夹叙夹议’，使读者分不清哪些是她的诠释和议论，哪些是采访对象的话。文中常常突兀出现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引语，读者必须使出推理破案的手段，从头找到尾，才能大致推断那是谁的话。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又差极，行文杂乱无章，读来宛若古人的‘错简竹书’，非常费解。”(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笔者认为，舒云的“文学”习惯使得其调查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所以在引用其结论前要做好随时会上当受骗的准备。

总而言之，周恩来在使叶群惶恐上的贡献被方方面面的人士极度夸大了。

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有过这样的比喻：“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不妨借用到“九一三事件”上——不管它是闹剧、悲剧，还是荒唐剧、糊涂剧，如果说天下对“九一三事件”的贡献共一石，那么林豆豆独占八斗，周恩来只占一斗，李文普、肖奇明、胡萍、张宏、吴法宪、李作鹏、毛泽东……共占一斗。顺便一说，当年最早提出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表扬林豆豆贡献的人就是周恩来。(《吴法宪回忆录》，866页)

吴法宪回忆，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马上又给他打电话调飞机，要胡萍来，不要时念堂来，甚至要吴法宪本人来。虽然吴法宪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但他语气恭顺，更多地还是从飞行安全出发，所以吴法宪的委婉答复没理由让叶群惶恐。

笔者认为，真正让叶群惶恐的原因是林豆豆不见了！

1971年10月6日发出的“中发〔1971〕6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说：“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中共中央65号文件和57号文件一样，肯定了林豆豆对“九一三事件”的贡献，特别强调了她的揭发对林彪（**笔者注：实际上是叶群**）“仓惶逃命”的贡献。

张耀祠回忆：“据林立衡未婚夫张清林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8341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吕学文回忆：“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她是一块‘心病’。她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她看到首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夜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他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吕学文《亲历林彪的出逃的前前后后》）

吕学文说的只是他看到的情况，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

张宁回忆：“据叶群内勤说，林立果在愤激中大骂林立衡走漏消息，要甩掉林立衡，叶群带着哭腔说：‘不行啊！少了立衡，怎么向首长交代？你去看看他们准备好没有，带他们一起走。’林立果气呼呼地说：‘他妈的，不走，老子拿枪毙了她！’”（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248页）

张宁还回忆了当夜她本人在56号楼吃了安眠药后的所闻所见：“张青霖把电源总闸拉掉，整个五十六楼陷于黑暗中。”“我正感到头脑昏沉药性发挥作用时，

院中突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这是林立果开‘匪车’的特点，猛冲猛刹。接着传来林立果特有的沉重拖拉的脚步声，从东边跑向西边来，听到外间起居室门被撞开来，沉寂了一会儿，卧室门猛地被打开，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心想这么晚了他还乱闯什么？到处是警卫，自己还提把枪，神经病！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子。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张宁《自己写自己》，248页)

对于张宁上面的这个回忆，自认为遭到张宁“恶意中伤，大泼污水”的李文普评论说那是张宁“别有用心地，任意涂抹编造”，“林立果逃命要紧，哪有心思在56楼下车去看望张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不过，李文普对张宁的评论给笔者他专挑软柿子捏的感觉，尽管林豆豆早就说过他是个“特务”，但他为了“政治正确”未敢对林豆豆反唇相讥“你才是个特务”，而是对张宁大加嘲讽：“据我所知，张宁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虽然是林彪点了头的，但并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选的‘妃子’很多，到山海关逃跑前还带着两个，林立果并非把她看得那么重，她也更没有照管过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编乱造，显然是别人有意叫她这样写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然而，张宁不仅在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自己写自己》这本“政治不正确”的书中提到9月12日深夜林立果到其住处的情节，而且在被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这本“政治正确”的书收录的《“九一三”事件前夕在林彪家》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五十七号楼的西半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我梦幻般地听见一辆汽车在院内紧急停住，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经过起居间直奔我的卧室，一个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他是林立果。屋内一片漆黑，鬼使神差的我竟然毫无声息，没有吭声。林立果匆匆推门一看，立刻又跑出卧室，随着引擎声响，汽车又飓风般地开走了。”(张宁《“九一三”事件前夕在林彪家》，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1995年，127页)

这两种说法的一个差别是把先前错误的地点“57楼”纠正为“56楼”，另一个差别是把“西半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改为“整个五十六楼陷于黑暗中”。美女通常自恋，何况张宁这样的资深顶级美女呢？所以张宁秉持林立果到56楼来是想带走她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李文普嘲讽张宁的自恋情有可原，但他否认林立果9月12日深夜到过56楼的情节并无什么依据。

事实上，林立果当晚开回96楼的小卧车按他的吩咐没有入车库(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8页)，而惯于开“匪车”的他开车到56楼以及他自己的住所57楼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情。笔者认为林立果到56楼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测林豆豆的行踪，当他看到的景象不管是“整个五十六楼陷于黑暗中”还是“西半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他肯定明白了林豆豆不在楼中，而此前叶群叫林豆豆、张清林和张宁回56楼是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去机场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林立果到56楼里面进一步查看无非就是为了坐实他的判断而已。

如果说此前令叶群担心的是狂妄自大的“老虎”东窗事发，那么此刻她和“老虎”都肯定明白了是那个刁钻乖戾的“豆老爷”在捣鬼了。

鉴于林豆豆已经告密去了，叶群和林立果惶恐之下，误以为他们的“两谋”行径已经败露，于是母子二人分头动作，一面叫起林彪准备北逃，一面通知周宇驰取消南下计划。

12、林彪为什么要连夜走？

林豆豆两次到北戴河8341部队领导驻地的密报都有叶群、林立果计划劫持林彪“先到广州、再到香港”的内容，那么林彪为什么最终连夜出逃并死在蒙古呢？

林彪为什么连夜出走一直是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争论不休的谜：到底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挟持走的呢，还是他自己同意走的呢，甚或干脆就是林彪带领叶群、林立果一起走的呢？

林豆豆始终认为林彪出逃是由叶群、林立果挟持或劫持所致，并非林彪自愿

北叛。

张宁不仅对林豆豆的看法进行了呼应，更有当夜“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汽车的具体描述。(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245-246页)

不过，林彪离开 96 楼时，林豆豆和张宁都不在现场，而且她们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当时在场的李文普的认同。

对于李文普，林豆豆有过这样的评价：“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李文普本人则承认：“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我在林办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林彪的安全和健康。实际上在他的健康方面我操的心、做的工作最多。林彪不相信保健医生，也不听叶群的话，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服什么药，都是由我主管。他相信我忠厚老实靠得住，从不叫我为难。”(《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请注意林豆豆和李文普说法的区别：前者说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是全方位的，后者强调的是“保证林彪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关于林彪决定连夜走的经过，李文普回忆：

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这才决定马上就走。大约 11 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也就是说，林彪在听了叶群的报告和劝说后，同意连夜走，并让李文普准备出行事宜。

京城孤魂认为，叶群很可能先进去把周恩来要来北戴河的事对林彪讲了，因此林彪非走不可了，至于去哪里，估计林彪还是飞广州的可能性大一些。（京城孤魂《“九一三”全景回放》，《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0年9月12日）显然，京城孤魂这里是把林彪看作“两谋”的参与者甚至决策者了，尽管他估计林彪临行前的目的地还是广州，即南下，而非北逃，所以此时骗李文普的不仅有叶群，更有林彪本人（笔者注：林彪告诉李文普是去大连）。

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参加过“两案”审理的于南强调：

“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及定性，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以及近几年一些史料的披露，除某些细节外，基本是清楚的。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是冷静的，措施也是得当的。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出逃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被叶群、林立果等劫持走或被骗上飞机的。这不符合事实。（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访于南：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引自《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08416.html>）

于南还指出：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究竟是否被劫持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跟随林彪14年，最后和林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此外，林彪在北戴河96号楼上车时，很多人看到并没有人强拉他上车。因此劫持的说法不能成立。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一个50岁左右

女人，20多岁的毛孩子绑架、劫持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管林彪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必须对出逃一事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访于南：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张聂尔对上述于南说法的评价是“雄辩的，令人信服的”。（张聂尔《风云“九一三”》，310页）

张聂尔本人还推测：

从林彪最后的叛逃看，似乎可以做出两种推测：一种如上述中央文件（笔者注：指中发〔1971〕65号文件）所说，林彪和林立果紧紧地站在一起。是他直接指挥林立果布置杀毛，在得知毛离开上海后，认为杀毛机会已失去，又让林立果布置南下另立中央，与毛对峙，但在12日深夜，突然得知毛到京的确切消息，认为毛回来后可以禁航和封闭全国机场，使南下不可能实现。此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往苏联，像王明一样做“寓公”，以待东山再起。另一种可能是：毛的南巡讲话使林彪感到毛同自己已完全对立，关系无法挽回，心情沮丧，决定“坐牢”或“从容就义”。而林立果的小舰队则决定谋杀毛。但毛及时离开上海，林立果感到杀毛机会已失去，于是飞往北戴河用各种理由说服林彪去广州“避风”，林彪同意去广州。但这天深夜，林立果、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的确切消息后，认为在毛的眼皮底下连去广州也不可能，林立果即向林彪摊牌：原来布置了杀毛，没成功，想去广州另立中央，现在看来也不行，毛回到北京，一切将被知情人泄露，儿子、老婆干的事，林彪推不掉责任。那时全家将遭杀身灭族之祸，与其成为俎上肉，不如逃。林彪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与老婆儿子去苏联。（张聂尔《风云“九一三”》，318-319页）

张聂尔的结论是：

无论是林彪要林立果去杀毛，还是最后林立果告诉了林彪自己要杀毛，林彪出逃的决心都只能说明林与毛已完全对立，林至迟在出逃前已知道杀毛阴谋，这使林无法再面对毛，连“坐牢”和“从容就义”也不可能。林面前只有一条路——跑。（张聂尔《风云“九·一三”》，319页）

总而言之，无论是于南，还是张聂尔，都认为林彪最终选择了，起码是同意了北逃。

不过，笔者不认同于南和张聂尔的看法。笔者认为：离开96号楼前，林彪同意的去向并不是蒙古/苏联，当时他受了叶群的蒙骗，真以为是连夜去大连。其实，于南也承认：“叶群也可能作了准备：万一林彪不走，到时就强迫他走。也不排除叶群说些瞎话欺骗林彪，或说些威胁、恫吓林彪的话。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不难理解。”但他的结论是“林彪决定逃跑”，其依据是“不管怎么说，最后下令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是林彪。林彪愿听他老婆、儿子的摆布，却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只能由他自己负责。”（《访于南：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但是，笔者认为于南的推理逻辑并不严密，林彪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与他信任警卫部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林彪并没有告诉李文普不要与警卫部队联系；说林彪“不信任中央”更是无从谈起，他本人当夜根本就没有与所谓的“中央”发生过任何联系。

事实上，如果林彪真的打算连夜潜逃，他完全可以打着“转车”的幌子出去，让李文普不必惊动驻地的8341部队，秘密地出发。稍后林立果不让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与外部（比如张宏）通话的目的就是如此。

从“林办”工作人员张云生和李文普等的回忆来看，叶群经常在各种事情上骗人，包括骗林彪，甚至把工作人员拉进来一起骗林彪。（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比如说，

1969年8月下旬，林彪重上井冈山。在临别的宴会上，东道主程世清对林彪说：“上次主席到井冈山时，去了我们南昌，这次首长来井冈山，政治意义重大，恳请首长也能光顾，江西的党政军领导，都盼望聆听林副主席的指示”。林彪点头应允了，但他们一起坐车到机场后，叶群却对程世清说：“这飞机太小，坐不了这么多人，您是不是先行一步，我和首长随后就到。”程世清只好按她的指示先行飞走了。可当林彪的专机起飞后，好长时间不见下降趋势，不仅随行人员，就连林彪也蒙在鼓里。原来，这一诡秘行动，只有叶群一人知道。林彪迷惑不解地问叶群，“飞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南昌？”叶群笑说：“不去了，直接回北京。”林彪有些不满，说：“你这不是拿地方官开玩笑吗？”叶群说：“我这是为你好。你现在去干什么？让你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谁能说清楚！？”如此一来，在南昌机场等候的程世清只有白等了。（吕学文、王松山《随卫林彪重上井冈山》，《文史天地》，2005年9期）

据笔者管见所及，没有工作人员提到过林彪骗他们的事情，只有林彪发现被骗而发大火甚至威胁要枪毙骗人者的事例。（《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那么，林彪为什么同意叶群的意见，决定连夜走呢？叶群对他说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他走的时候知不知道叶群、林立果是要拉他去苏联呢？而他告诉李文普的目的地是大连，是故意骗李文普吗？

进一步来讲，笔者为什么认为当夜林彪是受了叶群的欺骗呢？

笔者的依据就是下述的于南“证词”：

就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后，周恩来下令封锁飞机不久，晚11点40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急忙到林彪那里，叶先进去同林说了几句话后，再让李进去。林对李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叶群说：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2页）

笔者认为，从叶群“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这句话看出她当时在蒙骗林彪的事实以及她迫不及待出逃的心情，因为叶群当夜确实联系了吴法宪，而吴法宪根本就没有同意派飞机来，更别提他自己也来了。

笔者认为，从林彪当夜被叶群骗上不归路的事实看，聂荣臻关于“林彪是个

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的说法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么，叶群当时是如何骗林彪的呢？这也是一个至今未解，也可能是永远无解的谜，因为两个当事人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舒云推测：叶群“临时决定连夜走，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大叫快走，有人来抓你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525页）

林豆豆则把林立果扯了进来，她推测林立果“在对毛暗杀未遂后，才挟持爸爸上飞机出走的。他告诉爸爸：北京把黄、吴、李都抓了，你最好到大连去避一避。可上了天，就由不得爸爸了。”（李蘅《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天安门》，1998年8月）

舒云、林豆豆的猜测无异于说林彪是因为知情且害怕被抓而出走，并把黄永胜等人拖入了“两谋”。从舒云和林豆豆的上述言论看，她们位列“挺林四大女将”之中不是全无道理的。

笔者推测叶群当时对林彪是这样说的：“育容，快起来吧，总理同意你现在就去大连休养，国庆节前回北京开会。吴胖子已经坐飞机来接你了。”

因为原来林彪本人属意去大连，后来在叶群的一再劝解下，他才告诉李文普去广州也行（《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所以他听叶群一说还是去大连，自然很高兴。林彪一向体恤下属，听说吴法宪深更半夜赶过来，他自然要吩咐李文普：“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13、林彪发话后手下做了啥？

李文普回忆：

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

吧？”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 58 楼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宋德金回忆：

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笔者注：指刘吉纯）拿起话机正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林立果、李文普出去后，我立即到外边告诉八三四一部队姜大队长说，看来马上要走。姜大队长直奔 58 楼。（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 年 9 期）

刘吉纯回忆：

11 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他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我说大连，他立即拉断话机。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接着，他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

机看住，别让起飞。他们本想派一名区队长带人去，我说不行，要让于仁堂副大队长去。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 96 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2005 年第 1 辑)

从李文普、宋德金、刘吉纯的回忆看，他们当时都是按林彪正常出行在做准备，结果受到了林立果的干扰；另外，由于这三个人都与闻过林豆豆的告诫，因此也都做了额外的动作，比如李文普给北京的胡萍打电话，宋德金、刘吉纯各自向姜作寿秘密报告。

不过，刘吉纯的回忆同笔者前面提到的肖奇明回忆相抵牾。肖奇明回忆在林豆豆第一次告密走后：

张宏同志叫我通知区队以上干部到大队部开会。大约 10 分钟左右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姜大队长说：“今晚有情况，要做好准备。”并当场决定由副大队长于仁堂和一区队长黄树忠带领 10 名战士到机场去观察动静。如果情况属实马上把飞机扣起来，不许起飞，请示中央如何处理。(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 页)

也就是说，让于仁堂副大队长带队去机场是 8341 部队 23 点左右举行的干部会议上决定的事情，而不是应刘吉纯在 23 点 42-44 分之间的临时请求才决定的。

如果肖奇明的回忆属实，笔者认为，8341 部队的动作确实慢了点，因为林豆豆第二次的报告已经明确说了叶群、林立果要当夜走，而于仁堂的车在她第二次报告的 25-30 分钟后才出发。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李文普并非只是按叶群和林立果的吩咐仅让林彪专车的司机杨振刚备车，而是按林彪正常出行的程序，还通知了 8341 部队备好林彪出行需要的所有用车。

肖奇明回忆：

值班室里只剩下张副团长和我。大约 23 点半钟左右(笔者注：应在 23 点 35-39 分之间)，李文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林彪的卫士)来电话说：“通

知中直机关把所有大卡车都调到 55 楼来，马上准备出发”。我立刻报告张副团长，并去通知部队在 55 楼门前集合待命。当我返回大队值班室时，张副团长正在向上级汇报情况。于是我又给八大队（中央警卫团八大队负责北戴河海滨住地警卫）打电话，请大队参谋李炳根立即通知中直机关北戴河管理处，把大卡车全部调到 55 楼来。（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 页）

据笔者管见所及，所有“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者，无论持什么立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表明，于南的“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林彪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的推论并不成立，因为李文普向张宏/肖奇明调车的目的就是通知警卫部队护卫林彪去机场。

事实上，张耀祠的有关回忆证实了肖奇明的说法。张耀祠回忆：

是夜 23 点 40 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不过，许多研究人员，比如京城孤魂，把张耀祠提到的张宏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看作只是李文普调林彪的专车（京城孤魂《“九一三”全景回放》），而忽视了李文普还曾通知 8341 部队备车的事实。

此外，根据林豆豆的回忆：

张清林在 56 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到楼前，向道路两旁的部队喊：“快堵住，快到公路上来堵住！”然后直奔大队部跑来。（《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也就是说，为林彪服务的内勤张恒昌在林彪动身前还通知林豆豆快做准备，

以便她能跟着林彪一起走。换句话说，林彪并没有流露过甩下林豆豆的意思，这个和知情的叶群、林立果母子的做法不同。

14、“中央”有可能让林豆豆、张清林跟着林彪上飞机吗？

对于张清林赶到 8341 部队二大队部至林彪专车出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林豆豆回忆如下：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张宏说：“我早已派先行车去机场了，有的部队还没调来，是不是汽车出故障了？”这时已是 11 点 30 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默不作声，一转眼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只见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我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杨森也对张宏说：“飞机上了天，黑乎乎的，你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拦住，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

拦住吧！副团长！……”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萧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我们可冲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团长！”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我对张宏说：“你们是专门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如果首长被弄走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张宏一声不吭，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他说：“中央。”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他又不回答。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他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我指着值班室的电话机，要求他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他几次，他都不挂。我抓起电话筒说：“你不挂，那我就挂了！”他一听马上接过话筒向北京挂电话，说了声：“挂通了。”就把电话筒递给了我，可是我呼喊了几声也无回音，只听见军委总机的话务员说：“是叶主任吗？”我佯声嗯了一下，话务员说：“总理正在开会，马上就来。”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我放下话筒，告诉张宏电话没接通，请他再向北京挂电话。他很快就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并且还告诉张耀祠我们不肯跟着上飞机。我急了，一把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简单地向张耀祠报告了一下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欺骗的，不是要逃跑，现在情况万分危急，请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张耀祠在电话里只是：“嗯，嗯，嗯……”我不断急促地向他呼喊：“张团长！求求你，现在就下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还是在电话那头儿“噢、嗯、嗯”着，说他要“再请示”。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呀？！”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一辆红旗车已穿过56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从大队部门前开过去！”在张宏仍然没有下命令的

情况下，萧中队长和值班室里的其他干部带领战士冲了出去，张清林也要了一把手枪冲了出去，只剩下张宏和一位参谋呆在室内。(《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林豆豆这个回忆的主旨就是张宏食言，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拦林彪出行，而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还要求林豆豆、张清林跟着林彪上飞机。

那么这个向张耀祠/张宏下达命令的“中央”是谁呢？

持“林彪出逃是周恩来瞒着毛泽东布下的奸计”论的人认为，这个“中央”是周恩来；持“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终都是最终决策者，周恩来不过是个忠实执行人而已”论的芦笛认为这个“中央”是毛泽东。(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对“九一三事件”研究颇有心得的网友“史学”更有如下的详细分析：

好一个“我们是听中央的！”好一个“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充分说明，张宏得到林立衡报告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并且得到了中央明确的“指示”。这个明确“指示”，有两条：第一，部队按兵不动。第二，林立衡、张清林等，登机同行。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中央指示”来自何方？张宏先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报告，是合乎组织关系的。但是，林彪全家出逃，这样要命的紧急情况，张耀祠决不敢压住。逐级报给汪东兴、周总理也是顺理成章的。正因为这样逐级上报，才有张宏跑进跑出的那一幕。而且，张宏一定是要避开林立衡，才跑到其他地方去打电话。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汪东兴全程随侍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非常了解毛泽东一路讲话的全部内容和心态，非常了解毛泽东 12 小时前，刚刚惊心动魄地摆脱林立果“尾随追杀”的全部过程。因此，他得报后，肯定要立刻向毛泽东报告。周总理没有参加南巡。对当时党内职务比他高的林彪，擅自作出放弃保卫的指令，是不可思

议的。因此，这个“中央指示”，毫无疑问是出自毛泽东。毛泽东在当时的心情支配下，拿出了他最惯用的，也是最厉害的“诱敌深入”的杀手锏。如果当时毛泽东就对林彪作出“就地擒拿”的决定，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实属匹夫之勇。如果让对手做一次最后的“暴露”，来个“欲擒故纵”，才符合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大家”的风范。届时，对周总理这样的老同志，对全国人民，作出交代，也就顺理成章了。自林立衡向张宏报告情况，到张宏接到指示，有一个来小时时间。虽然紧了点，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时间是足够的。张宏按兵不动，就是“故纵待变”！要林立衡等一千人，统统上飞机，就是不要惊动林彪，让他放胆起飞。以收“一网打尽，彻底剿灭”之功效。毛泽东在南巡时，还告诫别人：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可见他马上要整人的狠心。所以说，毛对林是“仁至义尽”，那实在是“欺人之谈”，而要“一网打尽”，才是历史的真实！（《史学解读林彪疑案》（之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 年 5 月 2 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7749>）

无论是芦笛，还是史学，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让林豆豆跟着林彪上飞机，是他相信了林豆豆的密报，真以为林彪一家要飞到广州，实在不行才去香港；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彪的北逃令毛泽东大失所望并倍受打击。

毫无疑问，芦笛和史学都采信了《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的有关部分。

那么，林豆豆的这部分材料有多可靠呢？

笔者给它挑点硬伤出来：

林豆豆说当时已是夜里 11 点 30 分，还说她两小时以前就对张宏说好了……事实上，如笔者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林豆豆与张宏见面的时间在当夜 10 点 30 分之后，所以时间间隔根本不可能有两小时之多。

林豆豆说张宏转达“中央”让她和张清林“跟着上飞机，跟着走”的指示后，她气愤之下，给北京挂电话，在她呼话期间，恰好叶群在给周恩来打电话。笔者前面已经指出，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时间是当夜 11 点 22 分。但张清林赶到二大队部的时间是当夜 11 点 45 分以后，因为林豆豆说张清林一到大队部，张宏就说他“早已派先行车去机场了”，而先行车出发的时间是夜里 11 点 45 分。由此可见，林豆豆的叙述是多么的不靠谱。

当然，林豆豆也留下了她和张清林当时态度的真实记载，比如“气呼呼”，“质问”，“气愤之极”，“挥动着拳头”，“哭着喊”，难怪会招致张宏反感。

不过，林豆豆回忆中提到的当事人肖奇明、张耀祠虽然都有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但都没有提到“中央”要求林豆豆、张清林跟着林彪上飞机的事情。

此外，林豆豆回忆说她当时对 8341 部队的主要要求是阻拦林彪出行，而肖奇明回忆说林豆豆的核心要求是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

肖奇明回忆：

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他们（指叶群、林立果）要我回 56 楼准备自己的东西马上走。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 60 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同时，林立衡担心他们强迫她一起走，要求我们予以保护。在这紧张时刻，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再说，96 楼有林彪的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如果他们借口说我们暗害他们，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我请她跟我一起去大队部值班室去找领导。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到飞机场先把飞机控制起来，不能起飞。”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同志在电话里讲

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49页)

从肖奇明的回忆看，张耀祠曾经电话指示张宏把林豆豆保护起来。

对于李文普通知张宏/肖奇明调派 8341 部队车辆随林彪出行之后发生的情况，张耀祠回忆：

是夜 23 点 40 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从张耀祠的回忆看，毛泽东当时还不知情，即“中央还没有指示”。

当时在北戴河林彪住地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后来回忆了汪东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汪东兴对他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6页)

也就是说，当时情况复杂，不仅汪东兴下不了决心，周恩来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让部队监视、报告。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收到了类似的指示，即“林副主席要走，你们就跟上。”(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香港皇福图书公司，2010年2月版，217页，224页)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阻拦林彪出行”，还是“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在当时都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

因此，无论是汪东兴，还是周恩来，让部队和工作人员“跟上去”的目的除

了“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之外，更是遵循随卫林彪出行的惯例。

那么，“中央”，也就是毛泽东，有没有指示过林豆豆、张清林跟着林彪上飞机呢？

笔者认为，从时间上看，有这个可能：由于毛泽东大约在 23 点 45 分得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因此他可以在 23 点 55 分之前下达这个指示。从毛泽东对付林彪的一贯做法看，也有这个可能：1970 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毛泽东让汪东兴参加林彪召集的会议，其目的就是了解林彪集团的最新动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51-52 页）；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恶作剧般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笔者注：指陈伯达搞的“天才论”语录），你问他们要，一年要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李德生回忆录》，415 页）毛泽东的目的是想借此试林彪集团的应手；事实上，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受过林豆豆影响的程世清就曾经对毛泽东说过：“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李意根《程世清沉浮录》，《文史精华》，2008 年 11 期）所以毛泽东不会轻率地相信林豆豆“轰炸中南海”、“逃到香港”之类的密报，他如果真的指示过林豆豆跟着林彪走，那么他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假林豆豆之手获取关于林彪一家行动的更多密报，而决非是想把林彪一家“一网打尽，彻底剿灭”。

那么，张耀祠的回忆为什么不提“中央”，也就是毛泽东让林豆豆、张清林跟着林彪上飞机的这个指示呢？张耀祠随后只是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当飞机起飞后，林立衡又打了两次电话，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响声；第二次又打电话问飞机截住了没有。我认为林立衡同志这种行动是正确的，她及时报告，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是有功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笔者认为，一个原因是根本没有这个指示；另一个原因是林彪专机的悲惨结局，如果再提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就会给人很残酷的联想，况且由于林豆豆坚决

地拒绝执行这个指示，最终也没节外生枝。笔者倾向于后一个原因。

笔者还认为，如果毛泽东真有这个指示，而且林豆豆真的执行了毛泽东这个指示，那么“九一三事件”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假如林豆豆听了张宏转达的“中央指示”后，不在大队部继续耍横，而是乖乖地返回 96 楼，那么她出门不久就会在路上碰到迎面而来的林彪专车。

假如林豆豆伸手拦车，那么叶群会让司机硬冲过去吗？尽管林豆豆怀疑过叶群不是其生身母亲，但叶群决不会怀疑林豆豆是其亲生女儿。虽然这个时候林豆豆已经在背后对叶群下了黑手，但叶群会忍心下令让汽车撞死林豆豆吗？毕竟林彪也坐在车上啊！

假如叶群真的命令硬冲过去，司机会执行吗？车前面毕竟是林府的“豆老爷”啊！

假如林彪专车被豆豆拦下，哪怕只有几分钟，至少会有这么几个直接的结果：林彪卫队跟着走，于仁堂的先行车先到机场，256 专机加满油，全部机组人员登机，林彪在机场与周恩来通话……那么“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肯定会改写！

遗憾的是，或者幸运的是（对持“林彪不亡，天理难容”论的邓小平之类人来说，林彪的暴死无疑是件幸运的大好事），由于林豆豆完全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因此她就葬送了延长其父母和弟弟生命的一次绝好机会。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九一三事件”大戏中匪夷所思的一幕。

15、局面何时开始失控？

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时，尽管情况紧急，但从林立果走前告诉周宇驰北上并要其通知取消北京“小舰队”的南下计划，可以说此时的林立果尚以为局势在他的掌控之中，毕竟他懂得林豆豆的告密被“中央”认定是需要一个复杂过程的。

然而，林彪还没完全离开北戴河驻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林彪警卫中队中队长肖奇明朝林彪所坐的专车开枪。这使得车内的所有人都误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动手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完全没有保障了，他们面临的将是死路一条！

拒绝执行“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命令的林豆豆回忆：

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

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 58 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事后我问姜副大队长：‘我和你说得好好的，你怎么没带部队拦住呀？’姜副大队长流着泪伤心地说：‘副团长叫我上先行车了，我对不起林副主席……’姜副大队长等人气愤地告诉我，他们在先行车上一路等张副团长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反而给红旗车让了路……（《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当事人姜作寿的说法与林豆豆的说法有两大不同：首先，他没有在先行车上；其次，他并非没有进行阻拦。姜作寿回忆：

大约 11 点半左右，首长（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 96 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 58 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9-10 页）

姜作寿的说法得到了当事人李文普的佐证。李文普回忆：

汽车开到 58 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笔者注：林彪专车司机）加快速度，过了 58 楼。（《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此时此刻，假如是林豆豆扬手示意停车，叶群会让司机硬冲过去吗？

当事人肖奇明印证了姜作寿和李文普的说法。肖奇明回忆：

9 月 12 日 24 时左右，林彪的公务员小陈电话报告：“首长（指林彪等人）走了。”我接了电话立刻报告张副团长。从警卫人员的职责来讲，应该出面阻拦，如何处置要待中央的命令。当我飞跑到 58 楼和 55 楼之间的马路南侧时，大队长姜作寿同志也赶到那里。此时，只见一辆红旗牌轿车从 96 楼方向迎面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肖奇明《亲历“九一三”》，50 页）

另一个当事人吕学文，也否认了部队“没有进行阻拦”的说法，尽管这种阻拦是自发的。吕学文回忆：

这时，不知哪里的警卫战士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10 多名战士又打手式又叫喊：“停车，停车！”可是，汽车不但不减速，反而不断的按喇叭并加大油门，直接冲过了“人墙”。后来才知道，这时叶群在车内对杨振刚下了命令，她说：“8341 部队背叛了首长，要谋害首长，赶快冲过去。”中队长肖启明在第二道防线，他在大道的东侧，见汽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在战士们连连叫喊“停车”无效的情况下，他横向（防止伤害首长）向司机开了枪。可这是防弹车，子弹根本打不进去，汽车又冲过第二道防线。当汽车开出七、八米后，突然急刹车，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

并向车后跑了几步……(吕学文《亲历林彪的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 2005年10期)

一个警卫中队长居然敢朝他本该誓死保卫的首长的专车开枪,的确匪夷所思!

那么,肖奇明为什么开枪呢?肖奇明回忆:

……轿车从96楼方向迎面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然而这辆红旗车却在距离我们5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从车上下下来的是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当我追到离红旗牌轿车约20米左右时,林立果向我连开了两枪,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枪响,李文普倒下了。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我凭借着路旁的树作掩护,迅速掏出手枪。“啪啪”还击了两枪。林彪一伙见警卫部队有人竟敢拦阻他们的专车,并追赶不舍,而且公然开枪还击,更加惶恐万分,连车门都顾不上关,驱车仓皇逃窜……(肖奇明《亲历“九一三”》,50页)

注意肖奇明脑中一闪而过的“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这个念头,林豆豆对“九一三事件”的贡献在肖奇明开枪这件事情上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让人感觉荒诞的是,周恩来此前曾经发出过“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的指示(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6页);此后,也就是接到林彪专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还直接命令空司指挥所的调度员“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10-11

页)；甚至在林彪专机就要飞出国境前，毛泽东也只是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可他肖奇明就敢在林彪的专车强行通过但未造成任何恶果时，就不可思议地向尊贵的林彪开枪！

毫无疑问，肖奇明当时枪击的对象决非林彪本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肖奇明开枪可以说是他的心理应激反应，而不是预谋，更不是执行“中央”的什么指示。可遭枪击的林彪会怎么看？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虽然他是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军队的副统帅，但已经有人朝他开枪了，而且看起来是多次阻拦无效后的有组织的行动。鉴于林彪完全不知道林豆豆告密的事情，更不知道肖奇明所为与林豆豆告密的关系，他只能认为8341部队的行动是毛泽东下令这么干的！

笔者认为，肖奇明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肯定是他朝林彪开枪的事实曾经长期秘而不宣的最重要原因。

实际上，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4页)

舒云说毛泽东对肖奇明这两枪也提出了批评：“林彪的大红旗离开北戴河别墅，疾驶过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部，大队长姜作寿到路中央拦车，差点儿被撞。中队长萧奇明愤怒极了，他飞快地追车，他忘了这是防弹大红旗，连开两枪。萧奇明是神枪手，他的两枪打在司机头部位置，但因为车向前移动，这两枪的弹着点正在林彪的位置上。如果不是防弹玻璃，林彪就被打死了。毛泽东得知非常生气，说打死了怎么办？到底是谁害谁？打死了林彪就说不清楚了。因为没有后果，汪东兴说算啦，萧奇明没有被处理。”(舒云《百问九一三》(一)，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3038>)

鉴于舒云没有说出她的消息来源，以及她的“文学”习惯，因此笔者对她的说法半信半疑，记录于此，聊备异闻。

关于事情发生的经过，肖奇明的说法同吕学文的说法不同。前者说车先停下，李文普跳车，林立果先朝自己开枪，自己是还击；后者说肖奇明先开枪，然后车

停下，李文甫跳车。

张耀祠对该事情经过的描述，比肖奇明的说法早问世十年。张耀祠回忆：

汽车离开 96 号楼后，路上被 8341 部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十多米，李文甫（普）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甫（普）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注意：虽然张耀祠说肖奇明还击两枪，但他没说林立果朝肖奇明开过枪。

在更早的时候，查看过“两案”审理有关卷宗的于南说：

汽车下山经过 58 楼时，路边有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就按喇叭加速冲过 58 楼。过了挡车线约 100 米，李文甫突然喊停车，随即跳下车。车里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其左臂。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挡车的警卫部队战士见车停了便追了过去，也对汽车打了两枪，只见车门未关好就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189 页）

注意：于南明确说“车里有人”向李文甫开枪并击中，李文甫还击一枪，而警卫部队战士（**笔者注：即肖奇明**）追上去打了两枪。显然，于南的说法与肖奇明的说法对立，他实际上是否认“车里有人”也就是林立果朝肖奇明开过枪，所以肖奇明开枪并非“还击”。

另外，陈扬勇和高振普都认为肖奇明开枪在先。陈扬勇说：“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6 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阻拦，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

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10页）实际上，陈扬勇这里采信的是高振普2000年的回忆。（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1页）高振普在六年多后重出的修改补充版回忆录中说：林彪乘坐的“汽车冲向部队。战士们急忙闪开，险些被这夺命的汽车撞上。中队长肖奇明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他那两枪都打在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李文普察觉情况不对，果断地跳出车外，保全了生命。”（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3-164页）

综合姜作寿、李文普、肖奇明、吕学文、张耀祠、于南、高振普和陈扬勇的说法，并考虑其中的实质合理性与逻辑自洽性，笔者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林彪专车强行通过后，肖奇明朝专车开枪，然后李文普让专车停下并跳车，随后林立果朝李文普开枪，李文普则还击。

虽然就刺激林彪的神经而言，肖奇明的这两枪非常强烈，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对造成林彪的错觉才是致命性的。

16、李文普为什么跳车？

跟随林彪十多年的“亲信”李文普的跳车无疑使林彪感到他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

那么，李文普为什么跳车呢？

于南说：

李文普“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访于南：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

去》)

汪东兴说：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笔者注：指李文普）：‘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很快就到。’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6-207页）

但高文谦说：

1987年秋，在采访纪登奎时，纪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长期以来，中央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曾与李文普在一起办‘学习班’的张宁讲：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不过，李文普本人终于在 1998 年 12 月“讲话”了：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 56 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 58 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 58 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 58 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我在监护审查期间，如实说了我从林彪车上跳下来的原因是听到林彪讲“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不愿跟他逃去苏联才决心下车。（《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令人生疑的是，从实质合理性与逻辑自洽性角度看，林彪出发前才说过去大连，没过十分钟就改口说去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林彪会那么傻吗？

更可疑的是，难道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

邱会作说：“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

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程光《回味“九一三”，电子杂志《记忆》总 68 期，2011 年 2 月 28 日)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作为邱会作说法的佐证。张云生说，在 1969 年 10 月的紧急战备期间，“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乘飞机起飞后，定于 20 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 12 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张云生《毛家湾纪实》，319 页)

最重要的是，林彪本人以前去苏联就到过伊尔库茨克，比如 1950 年 10 月 8 日他与周恩来为抗美援朝之事去同斯大林谈判时，就在伊尔库茨克歇过脚、加过油。(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 年 5 期；吴志菲《周恩来参与决策开国第一战内幕》，《党史文苑》，2010 年 9 期)

在民间，除了对林彪会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有普遍的质疑外，还有就是林豆豆、张宁、张清林等人散布的李文普“自伤”说广为流传。

李文普曾经对此反驳说：“我已从林彪汽车上跳下来，干嘛还要打自己一枪？中央 1971 年下发的第 57 号文件，1972 年下发的 4 号文件，都明确说明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逃往机场强行起飞的。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组织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一枪是不是自伤。”(《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而且于南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189 页；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2 页)于南能这么说，一定是看过了林彪专车弹着点的有关档案。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李文普的反驳有理有据。

至于后来舒云“李文普不承认自伤，但他自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子弹擦过前胸到左臂。他从右车门下车，如果背向车门，应该擦后胸（**笔者注：应该是“后背”**）到左臂，如果面向车门，应该擦前胸到右臂。仅此一点，就证明李文普是自伤。”的分析和结论（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笔者感到十分可笑：人下车后相对汽车的方向，岂止“背向”和“面向”这两种？难道没有“侧向”吗？如果对“侧向”用360度来衡量，那么“背向”和“面向”只是其中人体与车体平行的两个特例：0度和180度（或者180度和0度，看考察者把哪个作为起点）；还有面向汽车正前方和汽车正后方的两种正交型“侧向”：270度和90度（或者90度和270度）……即使李文普是“背向”离开汽车，但他要往车后跑，自然还得右转，如果这个时候林立果开枪，子弹怎么不可能擦过李文普的前胸到左臂呢？其实，李文普说的很清楚：“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袁策祥在综合分析了舒云（实际上是张清林）、李文普等人的说法后，认为“李文普这一枪不可能是林立果打的。李文普后来改口（**笔者注：指从“默认自伤”到他伤**）只能是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乃应景之作。”（袁策祥《“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引自《百年林彪》，596-597页）

不过，据笔者管见所及，不仅官方代表人物张耀祠、汪东兴的回忆录有林立果朝李文普开枪的内容，而且“九一三事件”几个主要受害人的回忆录有着更明确的记述。

吴法宪说，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吴法宪回忆录》，862页）请注意这个时候，林彪一家还在奔山海关机场的路上。参加了9月13日早晨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李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回忆说，当时周恩来还不知道林彪一家已经死亡，周恩来讲，“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李作鹏回忆录》，698页），“林彪的老警卫员，

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邱会作回忆录》，794页)

也就是说，在李文普受枪伤后的七小时之内，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先后从周恩来嘴里得知李文普（警卫人员）被打伤的事实。由此可见，袁策祥想象出来的“李文普后来改口”、“应景之作”之说，实在经不起推敲。

那么，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李文普跳车呢？

从李文普 1998 年 12 月的“讲话”看，他刻意回避了三个重要情节：第一个是吕学文所说的战士们的自发阻拦，第二个是肖奇明的开枪，第三个是于南多次说过的李文普向汽车的还击。

前文提到肖奇明在接到李文普“马上准备出发”的电话后，就去通知部队在 55 楼门前集合待命，这可以作为吕学文所说的战士们的自发阻拦的一个佐证；肖奇明开枪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

那么李文普为什么只说“从 96 楼下来，经过 56 楼、57 楼到 58 楼”，“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呢？

既然“车到 56 楼时”，李文普就知悉了林彪叛逃苏联的意图，为什么在汽车“加快速度，过了 58 楼”他才跳车呢？只是因为他“思想上激烈的斗争”需要一定的时间吗？

笔者认为，被李文普刻意回避的肖奇明开枪这个事实才是他决定跳车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高振普所说的那样：“李文普察觉情况不对，果断地跳出车外，保全了生命。”(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4页)

值得一提的是，高振普在《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再版后记中表示：“在此书的第一版中，我对一些事情的披露确实存在着一些顾虑，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对周恩来研究的深入，促使我对一些史实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此次再版，……对第一版的很多章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再版回忆录中新增加的内容，我都送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审阅，并得到了她的充分肯定。(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286页)高振普两个版本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涉及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的内容，而肖奇明开枪后，“李文普察觉情况不对，果断地跳出车外，保全了生命”这些话则是“再版回忆

录中新增加的内容”。

当然，当天林豆豆对李文普的反复提醒，出发前叶群对李文普“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的催促，李文普打电话通知部队时“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的举动，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对李文普所表现出的“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的不耐烦，都可说是李文普决定跳车的“前因”/“潜因”，他临走之前就已经“越发怀疑”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不过，笔者认为，单是这些因素，包括肖奇明开枪这个关键因素，还不会导致李文普弃林彪于不顾而跳车。

宋德金回忆说，凭着他们当时对毛泽东和林彪的感情，那时他们大家深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走的，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一定会保护林彪，而不会让叶群、林立果得逞的。（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

而李文普恰恰具备宋德金们没有的条件，李文普自己也承认“我跟随林彪多年，他信任我，我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那么他在紧急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采取保护林彪的行动而听任叶群、林立果的“挟持”，且自己一走了之呢？

笔者认为，一定是林彪当时的某个言行让李文普觉得林彪原来是和叶群、林立果一伙的。

临行前，叶群“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和“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之类的言行，肯定让李文普明白他们是在防备毛泽东，但林彪的表现很正常，所以李文普只能跟着走。

笔者推测，8341 部队多批次阻拦专车的行为一定让一直蒙在鼓里的林彪感到惊讶，而肖奇明的开枪则让林彪大为惊骇！

毫无疑问，从9月6日起，叶群和林立果就没少在林彪面前讲毛泽东的坏话，但深知毛泽东为人的林彪一定认为毛泽东再怎么绝情、再怎么毒辣也不会对自己下死手的。

然而，此时此刻，林彪的警卫部队竟然向林彪开枪了！全然不知林豆豆捣鬼的林彪自然会认为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下死手了。

笔者进一步推测，惊骇之下的林彪脱口大骂了毛泽东，而林彪的骂声让李文普以为林彪是和叶群、林立果一伙的，于是他果断地跳车而去，并在林立果开枪时予以还击。

实事求是地说，李文普跳车意味着他确信林彪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

那么，李文普为什么确信林彪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呢？因为他发现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一起，都处于毛泽东的对立面。他开枪还击也算是一种政治表态吧。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李文普是因为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也就是林彪透露了叛逃苏联的意图后，才确信林彪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那么他跳车后必然会第一时间通过张宏/姜作寿向中央报告这个重要事实，反正他跳车连带还击的举动表明他已经和林彪彻底决裂了，何况他本人还被林立果打伤了。

不过，令李文普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肖奇明的开枪并非奉命行事，纯属肖的个人行为。在这一点上，李文普其实和林彪一样，当时都被肖奇明匪夷所思的行为搞懵了。所以在他到大队部明白事情的究竟后，就真的不好通过张宏/姜作寿向中央报告/解释他跳车的原因，特别是他开枪还击的动机了。

此时，在一分钟内惨遭两次重大打击的林彪会怎么办？

如果想生，最好是下车束手就擒；如果想逃，肯定是死路一条！生与死，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未完待续）

【文革遗产研究】

“红”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九

顾 土

革命的时代，思想和行为都不可能讲究严谨和理性，其特征就是波动、随意、放任，甚至自相矛盾，所有革命概莫能外。

革命是感性的时代，充满了艺术的色彩，当人们亢奋、激扬、癫狂，处于无

理性的时刻，艺术化的思维最有说服力，艺术化的形象最有感染力，艺术化的语言最有号召力，艺术化的定论也最有煽动力。“三座大山”最为典型，这既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生动的思维方式，也是对一部分人甚至对一种生产方式的形象认定，远比精当的理论和严肃的评价更能深入人心。

光明与黑暗，解放和压迫，革命和反动，左倾和右倾，这些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常用词汇，其实，都没有严格的内涵，也缺少像样的定义，更不具备法律层面的意义，而且是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革命本身的含义就不知变换了多少次，反动的内涵也是变幻莫测，光明与黑暗，各有各的说法，左倾与右倾，更是一笔糊涂账。文革前期被称为最革命的那些人和事，到了文革后期基本都被说成是反革命了；文革期间以革命派自居的人在文革之后一概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上个世纪前半叶显得很黑暗的那些事物，近些年人们又发觉原来并不那么黑暗；近 20 年的社会发展形式，在文革甚至文革前，也无不被批判为反动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彭德怀、林彪，究竟是左倾还是右倾，半个世纪以来谁也说不清楚；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解放生产力。以“三座大山”为例，这是当初革命的铁定原由，可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如果我们回忆过去对“三座大山”的那种宽泛解释，不能不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

在革命的时代，为了激起大众的情绪，发动造反的风潮，鼓舞队伍的士气，借助艺术化词汇的感染力，确实不可避免。艺术化的革命语言，尽管内涵含混，外表却色彩鲜明、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土豪、劣绅、恶霸、军阀、叛徒、顽固派、反动派、刽子手、人民公敌，这样的语言对大众来说，目标明确、界限分明，可以不假思索，也可以让革命运动随机应变，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有效地打击各个时期的敌人。可是，大众一旦理性、沉静、安下心来考虑问题，舆论用规范、客观、静态的语言描述社会，多数人都明白了事物的复杂性、人的多样性时，革命也就失去了激情，失去激情的革命面临的自然是沉寂、消停直至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往往在革命失败时，处于冷静反思时的许多革命者，其思想恰恰最有长远的历史价值，其举止也最贴近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动荡的年代，或者叫革命的时代，那些既艺术化又无严格定义的词汇，就特别夺目而且格外盛行；当社会转入相对稳定、统治讲究法制的时候，这类词汇便逐渐减少；假如社会彻底摆脱人治，进入持久的

法治常态，起码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中，在国家文件中，这种词汇就会完全消失。

什么是红色

在近现代革命的岁月，所有艺术化的词汇里，颜色的形容最简洁也最有力。其中，红色是革命者最崇奉最亲近的颜色。作为革命的代名词，这一颜色特别生动，外表非常明确，鲜艳无比，所以极为普及，容易掀起激荡的风暴。可是，包括红色在内的颜色，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外表，既可以自我涂抹，也不妨被他人刷上。而且，颜色属于一种艺术化的象征，只适合泄愤或崇尚时使用，也就是说，当一种人和一种事物已经被定性以后，才可以再用颜色加以形容，以强化自己的态度和感受，例如“黑五类”，否则，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指向，颜色就成了一种极其抽象的说辞。

1928年之前，在北京政府眼里，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南方革命党都属于红色，叫做“赤化分子”，张作霖的“讨赤”，对付的主要是国民党的部队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国民党里，1927年前，很多人，包括蒋介石，并不排斥“赤”。这不但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包容了中共，而且还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以中国革命为己任。孙中山去世时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可的名言，革命，在中外都与红色牢牢联系在一起。但在1927年以后，红色就成了中共的专属，至少在中共的话语里是如此。军队叫红军，工农武装叫赤卫队，占领的地盘是红色根据地，政权是红色政权，旗帜、领章、帽徽、袖标也是非红莫属。相对而言，国民党控制的军队被称为“白区”，军队叫“白军”、“白狗子”、“白匪”，屠杀行动则是“白色恐怖”。此外，红色，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颜色归属，是身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必然选择，是对苏联革命的自觉认同。因为全世界所有共产主义的党和国家都高度认定红色的象征意义，苏联的军队就叫红军，对立面则叫白军，逃亡在外的“白俄”也是革命的对象。

从1927年以后，尽管红色的内涵不时变换，但基本都是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容词。1949年以前，白是国民党，红是共产党。1949年之后，地富反坏右、机会主义分子，属于黑；而劳动人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红。到了

文革，几乎是每两年一变，初期的造反派是红，但到了后来又被否定，自然也就变黑了；王力、关锋、戚本禹，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也都是由红转黑，最后连“四人帮”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转变，他们的头上都有个帽子，红的时候是革命造反派、革命家、革命旗手、革命副统帅，黑的时候就叫反革命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五一六。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红色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烙印，是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形容，更是阶级立场的自我认定。红色中国是相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而言，党旗和国旗的红色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颜色。“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指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不会改变。

红色大泛滥

文革前的 17 年，尽管 1957 年初毛泽东公开宣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事实是，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仍然以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式亮相，大量的人被打倒，大量的人被关押，大量的人被划为敌人，所以，这 17 年依然处于革命斗争的尖锐时期。既然处于斗争之中，那么，红色成为一种畅行的词汇，甚至作为一种标准，也就不可避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又红又专”，是对革命接班人的要求；《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红岩》、《红旗谱》、《红日》，是全国人民崇尚的文艺作品，“白专道路”是受批判的靶子，而“插红旗、拔白旗”则是因领袖号召而掀起的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

1966 年开始，红色开始在中国大地泛滥，其泛滥的程度空前，或许也是绝后，无所不用其极。

人手一册甚至多册“红宝书”，任何地方都挂满了红色横幅，所有场所都是红旗招展，男女老少个个心向红太阳，人人誓死捍卫红色司令部，各类大会和游行让处处都变为“红色的海洋”，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红袖标、红领章和红帽徽，更是深入各个角落。1968 年 9 月，29 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被形容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与红色对立的是黑，被叫做黑司令部、黑五类、黑干将、黑爪牙、黑帮、黑线、黑书、黑画、黑诗的，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几乎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一大批“黑”被揪了出来。文革前 17 年，红旗的对立面，按照毛泽东在 1957 年和 1958 年的说法，是白旗，就是资产阶级，是右派，对立面由白而黑，可以想见，文革所要打倒的人和事，与文革前相比，其形象色彩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暴力、躁动、疯狂、颠覆、无理性，革命的主要特征几乎都得到了最大体现，其中，文革对革命的极致性发挥，就是各种艺术化、随意性、夸张式的形容，包括丑化和美化，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铺天盖地。亲密战友、旗手、反潮流、小将，可以作为一种正式的说辞，用来肯定和赞颂一类人；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跳梁小丑、牛鬼蛇神、阎王殿、小爬虫、破鞋、学阀、阶级异己分子，也可以作为一种文件用语，形成罪名，陷人于囹圄，直至置人于死地。用颜色作为敌我分类的界限，在文革中更是畅行无阻，远比中外历史上的任何革命都有号召力，红与黑，让所有人的命运分成了天上地下。

文革这场革命又有别于世界上的所有革命。这场革命，既非国家政权更迭，也不是政治阶级或阶层之间的较量，而是处于和平时期的最高当权者，在地位十分稳固，其政权没有面临任何威胁的情形下，自上而下，再通过上下互动，对全党和全国进行的全面清洗。所以，当政者可以动用全国的舆论，以最强大的声音，高度传播自行制造出来的各种艺术化、不规范、夸张式的形容，红色的覆盖程度、权威程度、杀伤程度，因而也达到了中外历史的顶端。

红色的转型

文革前的红色，其含义在文革中完成了根本转型，可以说，从前绝大多数被认为红色的那些人、事和作品，比如刘少奇、陶铸、瞿秋白、王若飞等等，还有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参与的那些事情、写出的那些读物，都遭到彻底否定，被划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变成了黑色。连小说《红岩》、《红旗谱》，歌剧《洪湖赤卫队》，电影《红霞》、《红日》，歌曲《红梅赞》这些红得不能再红的红色文艺，都被批判为“封资修黑货”，连在文革中拍出的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这些除了红以外什么都显得微不足道的影片，都因红得不够或有黑色嫌疑而遭到文革当红人物的严厉批判，可见，那个年代，红色的内涵，昨是今非。

在文革中，无论人与组织，还是事与作品，是否红色的标准，一是必须始终贯穿着极端的个人崇拜，绝对忠于领袖；二是参与的人和事绝不能与“黑线”有任何关联。以文艺为例，文革中可以演唱的歌曲，无不充满了对领袖的崇拜，或者干脆就以领袖语录和诗词为内容，其中作曲家李劫夫最当红，但当他与林彪事件沾上边之后，其作品在公开场合也就销声匿迹了。晋剧《三上桃峰》，因为被怀疑与王光美在“四清”时树立的典型桃园大队有关联，于是被全国大批判，而湖南花鼓戏《还牛》又因为类似《三上桃峰》中歌颂的“还马”，所以也被株连。我们今天认定的红色经典，大多在文革中因为与黑线的牵连而被划为黑货，当文革结束，那些属于“黑线”的人物又成为“红线”，相关作品的颜色也就随之一变。

文革中的颜色转型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社会认定的红色作品，但当作者被划进黑线后，作品的红也就黯然失色了。“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这是周恩来的题词，而毛泽东对红色英雄刘志丹的评价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尽管刘志丹的红色形象没有被否定，但小说《刘志丹》却在1962年以后因为涉嫌为高岗翻案而遭到批判，还被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大批人因此遭殃。翻阅小说《刘志丹》，恐怕看不出其中哪里有不红的地方，可是，这种红如果一旦被人与“黑线”相联系，红也就变成黑了。

是否红色，文革中还与“红线”人物的认定存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特殊的身份，江青等人在文革中一直属于红线，几乎与领袖的绝对权威一样，不受质疑，也不能质疑。与他们对立的结果，最后无不被划入“黑线”，或是准黑线。所谓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其实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忠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在文革中的指导地位。因此，得到江青的肯定，其红色归属也就自然而然了。芭蕾舞，按照文革的思维方式，本应该属于受批判的艺术，但事实是，芭蕾舞在文革中却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和重视，成为西方上层文化融入中国极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一个奇迹。这是因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被归入红色，变成“样板”，而这种红色的归类又与江青结为因果。

文革对红色的认定，与政治风云一样，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后期由于林彪

事件发生，特别是邓小平主政以后，前期的一些所谓黑线人物又被重新起用或被恢复名誉，与他们相关的事件和作品也因而转红，比如《长征组歌》。相反，抗战期间与红色有关的战绩“平型关大捷”、文革前期的红色口号“活学活用”等，却都随着林彪事件而失去了原有的声誉；聂元梓、蒯大富等高校群众组织的红色领袖，也纷纷丧失了那份保护色，沦为阶下囚。

红色是历史

在一个时代，如果政权喜好使用含混的词汇，就证明这个时代本身非常混乱——比如文革中全国各省（包括省级的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时，被宣传为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这个说法等于说此前的各级中共政权不是红色政权，这不是变相否定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吗？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生命和行为不可能得到尊重，法律和执法也必然被社会所轻视。如今，起码名义上讲究的是法制，所以，在国家表述中，含义明确、界定严格的词汇成为主流。文革和文革前一直通行的那些革命年代的词汇正逐渐衰落，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话语，尤其是红与黑，否则，用颜色去划分现实中的那些人和事，未免尴尬。

在现行刑法中，曾经最重要的“反革命罪”已经不复存在；在正式文本中，从前最流行的左右倾也不见了踪影，“反动”一辞正变得日益生疏；只有国体表述中还有与过去红色相一致的地方，即便如此，当今也很少有人以红色来形容当下的生活状态。红色旅游去的只是曾经红过的地方，红色经典说的也只是从前的作品，深圳虽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但今天去深圳绝没有人会归为红色旅游，即使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的作品，也不会有人将其归纳为红色文艺。

从前的各个时代，红色的内涵虽然多变，但红色所表明的历史却是相当清楚的，这就是阶级斗争观念所体现的社会历史。

在中国，红色，说白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代表着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政党，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所谓红不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外来侵略、反法西斯、爱国、爱民，并非无产阶级的专利话语，也不是共产党最终的奋斗目

标，假如将这些也当作红色的话，依照红色时代的说法，是丧失阶级立场，是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区别，是“将无产阶级先锋队混同于普通资产阶级民主政党”。

以共产党领导，以革命为目的，才可以归为红色。以红歌为例，夏之秋在抗战期间写下的《歌八百壮士》是当时流传久远的名作，但无人将这一作品归入红色，后来在大陆连唱都没人敢唱，因为《歌八百壮士》歌颂的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而《游击队歌》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虽然不是党员，还未加入新四军，可他却是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慰问时写给八路军将士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就被归为红色。

抗日战争之前，红军、红色根据地，让红色格外鲜明，红色的目标就是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抗战时期，依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退隐，红军改编为政府军国民革命军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红色根据地则叫边区；抗战胜利，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红色目标再次变得非常夺目，解放就是为了让全国变成红色江山。

红色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表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红色都代表着无产阶级及其专政，当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中国才属于红色。作为阶级，如果红色在中国也有外延的话，那就是作为同盟军的“贫下中农”。红色的对立面在国内是国民党、地富反坏右，在国际是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文革期间，红色尽管空前泛滥，但内涵却变得空前狭窄，而对立面则变得无比广大。改革开放之后，阶级斗争观念一步步被抛弃，与之相关的政治语汇和未来理想失去了现实价值，红色进入了历史。

可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红色所代表的这一切恰恰来源于阶级斗争学说。今天可以不讲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淡化，但不等于过去很长时间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不等于说因此就可以否定一个党一个政权一个社会是因阶级斗争的思想而产生的事实。

如果回避这些历史，将红色只作为一种美好的标志，让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纳入红色的范畴，比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河山都统称为红色，将一些时尚流行歌曲也称作红歌，那红色也就丧失了意义，而且也是自我否定了革命的历

史。

【简讯】

王广宇回忆录《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问世

樵 余

曾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阶段（1967年1月—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自嘲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的王广宇先生，在中央文革小组勤勤恳恳工作一年，却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七年。近年来，在不断的回忆与反思中，王老撰写了不少文章，记叙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中的亲历和见闻，其中一些篇章先后在《世纪》、《建设者》、《党史博览》等杂志和《往事》、《记忆》等电子刊物上发表，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更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最近，在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和《记忆》编辑部的帮助下，82岁高龄的王广宇先生将有关文章汇集编为《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一书，自印分送亲友。他在前言中自述：“这个回忆录所要表达的，一是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向历史作个交代，二是说点想说的话，聊以自慰。”

【小资料】

近年高校文革研究学位论文篇目计略

边 棣

按：长期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下面的学位论文篇目告诉我们，尽管禁忌多多、困难重重，但文革研究在国内高校仍旧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论文篇目同样值

得研究：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文革研究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党校？为什么近二十年的文革研究学位论文以北京和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高校居多，而西北、西南地区高校只检索到各一篇？为什么有的“名校”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还不如其他院校？为什么有的题材研究的人多，有的题材则无人问津？为什么有的年代一篇也没有？……

这是通过网络检索和友人提供而编成的一个远不完备的论文篇目，谨望知情者补苴罅漏。

硕士论文——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90 虞文清著 指导老师陈诗惠 中共中央党校

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几点认识

1986 郑谦著 指导老师于南 中共中央党校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持续

1989 宋海庆著 指导老师许迈扬 中共中央党校
社教运动中的夺权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1989 曹力铁著 指导老师陈诗惠、许迈扬 中共中央党校
对二十年“修正主义文艺”批判的检讨

2000 柏定国著 武汉大学

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探析

2009 张越著 指导老师李彩华 东北师范大学

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9? 江振国著 中共中央党校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93 韦祖松著 指导老师于南 中共中央党校

毛泽东的平等诉求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2005 申林著 指导老师姜威 北京师范大学

论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个案

2003 王青山著 中山大学

文化与“文革”：从文化理念的视角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2006 赖永祥著 指导老师黄椰婴 中山大学

影响“文革”的政治文化因素探析

2005 唐靖著 指导老师耿向东 北京师范大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探析

2007 刘淑静著 指导老师李彩华 东北师范大学

“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探析

2008 杨一静著 指导老师肖贵清 河北师范大学

- 西方学者对“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研究
2008 王凤恩著 指导老师蒋贤斌, 梁怡 江西师范大学
- 论“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
2006 曹军著 指导老师何一成 湖南师范大学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 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观说起
2008 邹文洁著 指导老师杨德山 中国人民大学
- “林彪路线”的两面性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路线”实质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启示
2006 兰继华著 指导老师阿明布和 内蒙古师范大学
-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持续: 兼述邓小平同志的法治思想
1990 涂天向著 指导老师许迈扬 中共中央党校
- “文革”岁月邓小平的沉浮与中国社会的衰兴
2002 乔水舟著 中国人民大学
- 1966-1976 中国的政治博弈: 一个关于政治精英的分析
2004 谭翀著 指导老师何云峰 河南大学
-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探析
1989 王海光著 指导老师于南 中共中央党校
- 红卫兵小报及其代表思潮研究
2007 王丽莉著 指导老师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三支两军”述论
2005 张东明著 中国人民大学
- “文革”时期山西夺权研究
2009 张宁著 指导老师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
- “文革”初期山东“二·三”夺权评析
1991 吕德义著 指导老师于南 中共中央党校
- 武汉军民抵制“文革”错误的一次英勇抗争: 试论“七·二〇事件”的原因
1990 苗立峰著 指导老师于南 中共中央党校
- 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
2008 王芳著 指导老师黄岭峻 武汉理工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
(1966-1971) 2010 赵嘉琛著 指导老师樊明方 西北工业大学
- “文革”时期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研究
2006 林林著 指导老师汪征鲁、赵建群 福建师范大学
- “文化大革命”时期滕县粮食生产研究
2011 王其科著 指导老师张巨成 云南大学
- 评析“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
2006 黄晨著 指导老师李永丰 中国人民大学
- “评法批儒”运动研究
2004 魏旭斌著 中国人民大学
- 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 一场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重大斗争
1986 张沱生著 指导老师许迈扬 中共中央党校
- 四五运动发生原因的社会心理探析
198? 朱兆中著 中共中央党校
- “五七”干校的历史考察: 缘起与概貌

- 2008 张延明著 指导老师潘焕昭 中国人民大学
“文革”前与“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研究
- 2007 方英著 指导老师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
- 2006 孙杰著 指导老师陈国清 武汉大学
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浅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2002 江京晖著 外交学院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备战研究
- 2010 兰天著 指导老师李彩华 东北师范大学
“文革”中留京工作的外国专家不同道路的选择：以李敦白、马海德等为例
- 2011 武宇红著 指导老师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
“文革”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1966-1968）
- 2007 王媛著 指导老师茹莹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1966-1969年阶段中国外交的研究
- 2004 陈丽萍著 指导老师张历历 外交学院
外交政策的超意识形态性：对“文革”后期中泰关系的研究
- 2006 秦艳峰著 指导老师汪新生 中山大学
试论“文革”后期的对外经济工作开拓
- 2008 尚长风著 指导老师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革”时期福建经济研究
- 2006 陈秋兰著 指导老师叶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赤脚医生研究
- 2007 刘影著 指导老师汪征鲁 福建师范大学
集体记忆的多维建构：以“停课闹革命”的三种叙事为例
- 2008 陈婷婷著 指导老师康丽颖 首都师范大学
“失落”的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可吸取的基本教训
- 2008 王智敏著 指导老师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文革”时期“老五届”大学生的心理嬗变之探究
- 2007 阮学旺著 指导老师叶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员研究：以《人民日报》报眼为对象
- 2009 余盛著 指导老师阎润鱼 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民众的伦理心理初探
- 2002 朱毅著 武汉大学
论“文革”对鲁迅的接受
- 2008 林宁著 指导老师贺仲明 南京师范大学
关于“样板戏”的历史考察
- 2007 谭培育著 指导老师汪云生 中国人民大学
样板戏电影的叙事与修辞
- 2001 林盈志著 指导老师倪震 北京电影学院
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
- 2006 宋光瑛著 指导老师吴迪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李鸿章批判研究（1970-1976）
- 2011 李振著 指导老师肖永宏 南京师范大学
喧嚣与寂寥：小靳庄诗歌创作现象研究

- 2007 梁珊著 指导老师刘进才 河南大学
“文革”时期颜色词和军语词意义变异分析
- 2003 周毅著 指导老师池昌海 浙江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
- 2004 华玉著 内蒙古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蒙古文小说研究
- 2011 吉日木图著 指导老师王海梅 内蒙古大学
“文革”时期的北大荒版画
- 2009 杨柳著 指导老师王同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革”如何炼成今天的吴冠中
- 2010 田萃著 指导老师颜新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革”时期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前后的专业音乐教育研究
- 2006 盛露露著 指导老师戴嘉枋 中央音乐学院
“文革”时期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状况研究
- 2007 闫飞著 指导老师黄红辉 江西师范大学
“文革”之《钢琴初级教材》研究
- 2009 张璐著 指导老师胡小满 河北师范大学
论黎澍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反思
- 2007 李亚静著 指导老师高峻 福建师范大学
“新时期”老年“文革回忆”散文研究
- 2007 郭威著 指导老师江震龙 福建师范大学
中国“伤痕文学”与日本战后派文学比较研究
- 2010 蔡希广著 指导老师刘立善 辽宁大学
斗争哲学与农民人格精神的书写
- 2007 兰传斌著 指导老师贺立华、莫言 山东大学
九十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思潮中的“文革”书写
- 2008 甘成昀著 指导老师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
论90年代以来王安忆小说中的“文革”叙事
- 2010 王晶著 指导老师王家平 首都师范大学
王安忆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 2010 陈靖之著 指导老师张均 中山大学
严歌苓小说的“文革”叙事
- 2007 王苗著 指导老师沈庆利 北京师范大学
陈凯歌影片中的“文革”情结
- 2008 刘雯著 指导老师唐文斌 河北师范大学

博士论文一一

- 50、60年代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1999 张明军著 指导老师周敏凯 华东师范大学
“四清”运动研究
- 2004 林小波著 指导老师郭贵儒 河北师范大学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研究
- 2007 于兴卫著 指导老师刘晶芳 中共中央党校
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漩涡中：“文革”初期的周恩来：1966-1969

- 1994 崔久衡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关于林彪集团问题的再研究
- 1999 周敬青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大动乱年代的艰难抗争
- 1994 郭文亮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
- 1995 张志明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
- 1990 杜蒲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论红卫兵政治思潮
- 1999 范明强著 指导老师彭明 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
- 2005 印红标著 指导老师潘国华 北京大学
“破四旧”运动研究
- 2007 黄延敏著 指导老师王顺生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时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
- 2010 向前著 指导老师陈明明 复旦大学
“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
- 2002 叶青著 指导老师汪征鲁、赵建群 福建师范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
- 2002 赖正维著 指导老师汪征鲁、林强 福建师范大学
“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研究
- 2008 高田钦著 指导老师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
- 1994 程晋宽著 指导老师金一鸣 华东师范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 1997 周全华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 1999 张曙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五·七”干校研究
- 2008 张绍春著 指导老师莫志斌 湖南师范大学
跨越鸿沟：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
- 1991 宫力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拨乱反正的历史思考
- 1996 姚振军著 指导老师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
“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研究
- 2007 王宇英著 指导老师梁景和 首都师范大学
单位“文革”研究：以全国妇联为个案
- 2007 耿化敏著 指导老师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革”文化霸权
- 2006 余学玉著 指导老师胡有清 南京大学
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
- 2002 金鹏著 指导老师林尚立 复旦大学
毛泽东图像研究

- 2005 杨昊成著 指导老师范景中 南京师范大学
“文革”时期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
- 2008 徐琼著 指导老师张昆 武汉大学
“文革”时期的中国翻译：“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 2007 李晶著 指导老师崔永禄 南开大学
论中国“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
- 2005 马士奎著 指导老师辜正坤 北京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出版研究
- 2007 陈矩弘著 指导老师曹之 武汉大学
“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史学研究
- 2008 杨舒眉著 指导老师牛润珍 中国人民大学
语言变异与社会身份建构：以“文革英语”建构高校英语教师身份为例
- 2010 张焱著 指导老师田毅鹏 吉林大学
“文革文学”研究
- 2009 陈纯尘著 指导老师汪征鲁 福建师范大学
“文革”主流文学论
- 2003 武善增著 指导老师丁帆 南京大学
《朝霞》：“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样板
- 2006 杨懿斐著 指导老师李新宇 吉林大学
“文革”十年小说研究
- 1999 廖述毅著 指导老师许志英 南京大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创作研究
- 2007 董建辉著 指导老师吴义勤 山东师范大学
“文革”主流小说的话语形态及其延伸
- 2008 肖敏著 指导老师张志忠 首都师范大学
从显赫到湮没：“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研究
- 2006 雷亚平著 指导老师张福贵 吉林大学
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文革儿童文学史研究
- 2009 杜晓沫著 指导老师黄也平 吉林大学
“红色”中国的“杂色”呈现：论海外华文/华人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 2009 周聚群著 指导老师曹惠民 苏州大学
试论“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以巴金、夏衍、曹禺为个案
- 2001 (韩)李喜卿著 指导老师陈思和 复旦大学
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文革叙事”
- 2010 杨丹丹著 指导老师张福贵 吉林大学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文革”叙事
- 2007 黄河著 指导老师王尧 苏州大学
小说中的“文革”
- 2005 张景兰著 指导老师杨文虎 上海师范大学
人道主义与“文革叙事”：中国“文革”后小说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 2005 李兴阳著 指导老师丁帆 南京大学
创伤记忆与灵魂诉求：当代小说中“文革”叙事的精神历程
- 2005 黄云霞著 指导老师吴秀明 浙江大学
戴厚英文学中人与时代的互相关系

2008 张善姬著 指导老师陈思和 复旦大学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
2005 王朝晖著 指导老师于群 东北师范大学

博士后报告——

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话语研究

2007 黄擎著 复旦大学

“文革”主流文学研究

2005 武善增著 指导老师朱晓进 南京师范大学

【编读往来】

1、向明谈向红文：

感谢周宇驰女儿向红的文章，她文章的重要性是谈到了林立果亲信的思想动态，十分珍贵。特请代我向周女士表示敬意和慰问。希望她健康长寿，能够亲眼看到父辈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中国社会走向正道！

2、向红对《四十年有感》的更正：

文中“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号……”那一段，有时间上的记忆错误，经作者查询后作出更正并向读者致歉。现将该部分文字修改如下——

记得是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那时我是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的工农兵学员，一早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和父亲他们过节，“调研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还有香港流行歌曲的卡带，我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是痴迷，去了就会翻看。在后来的“流放”日子里，我发挥了从小爱讲故事的特长，曾经悄悄地在田间地头给一帮从“九一三”学习班放出来“劳动”的阿姨们绘声绘色地每天讲一点，她们听得津津有味，视为苦中作乐。

那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在客房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

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实况，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

3、于永发对向红的《四十年有感》一文提出质疑：

我借贵刊一角，向《四十年有感》的作者提三个问题：

一、1971年，你还不到十七岁，令尊大人怎么可能跟你谈那么多的党国大事呢？

二、你的文章中在谈到令尊大人的计划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又说去广州，又说去国外。

三、研究者已经有了定论，林立果没有飞到广东另立中央的事，你的文章与这个定论相左。

4、向红答复于永发：

《记忆》编辑部转来了于永发先生对我文的置疑。兹复于次——

第一个问题，我父亲说了那一切，的确是真实的。那样的话平时他们多少都有流露，因此坐下来跟我比较正式地“交底”，我也不觉得突兀。当时，我是被妈妈逼急了，想“调”飞机回广州，觉得自己是部队的人了，翅膀硬了，以后不用回家

受妈妈的气了(当时我在上海当兵,本来想去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因为觉得上海离北京还不够远,就选择去了广州读医科)。我从小到大都是很“优秀”、很乖的孩子,唯独妈妈不喜欢,总跟我过不去。这次我跟妈妈急了,对我父亲而言是“后院起火了”,所以他专门回了趟家,那时他已经很少回家了。可能看我的倔劲儿犯了,父亲跟我说了很多,可惜我记的不全。不能用现在看17岁孩子的眼光看那时候的我们,只要是当兵了,就是大人了。很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我们坐在屋里,气氛很凝重,天渐渐黑了,黄昏里看到的父亲眼里的泪光……对此我也是慢慢才理解的,曾经怀疑他后悔了?胆怯了?……那眼泪反映了他的内心百感交集,很复杂,有义愤,也可能已经预见了自己最后会去死,舍不得我,舍不得老母亲和家人吧。

第二个问题,他们要去广州在前,去国外是父亲在送二叔和我哥哥去火车站的路上才说(“谁也顾不了了”)的。那时候我二叔马上猜到了他会去国外,但二叔并没有跟别人点破。所以我妈妈下了车还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而他的回答明显是诀别了,不再管家里了。

第三个问题,林立果他们是有几个方案的,其中一个是要去广州的,这个不是秘密,曾经被披露过了。即在没有追杀的前提下,没有被发觉的情况下去。这个以后的文章里会涉及到。但他们到广州是不是另立中央,我并没有说。

2011-10-27

5、印红标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期文革述略》一文的注释:

贵刊76期关于新疆的文章的注释提到一本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生产建设兵团志》卷3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我在北大图书馆网页查看“生产建设兵团志”,没有查到。再核对,书名应当是《新疆通志·生

产建设兵团志》，书的封面大字标题是“新疆通志”。所以作者省略了不应当省略的几个字，不便读者查找。

6、陈益南谈余汝信、程光文：

读了本期（77期）余、程二位的文章，有些不安。因为，我感到，这已不是看法争鸣，而是二人都相当带有了意气，在斗气了。

原本，邱会作回忆资料的问世，是件大好事。在编纂之际，难免会有差错。错了也不要紧，指出来，或改过来就是。只是不要对编纂者进行动机猜测，那样，事情便容易走偏。而从现在余、程二位的文章看，已有走偏的苗头。为此，我建议：

（1）《记忆》与他们二人分别沟通，熄熄显然已冒出了的火苗。大家都是为研究文革历史，在做义务工作，须理智为上，不必为文章正误而动感情。

（2）《记忆》不再刊发带有意气成份的争论文章，以免扩大负面影响。

7、福建读者致《记忆》：

《记忆》编辑部：

您们好！盼来《记忆》77期，但也带来失望。虽然余汝信先生和程光先生的文章都发表了，本以为有了了解答案的机会，但是程光先生并没有对余汝信先生指出的问题做出任何回答。

程光先生对余汝信先生有通篇指责，似乎二位之间过节很深。本人认为程光先生追究余汝信先生是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主编，余汝信先生是不是对得起程光先生的友情和信任，和程光先生要回答的问题无关。同时，《邱会作回忆录》是不是有瑕疵，《邱会作回忆录》是一个怎样的成稿过程，和程光先生的《对话》

是不是有假也是无关的。但是作为读者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给我们甚为尊敬的《记忆》杂志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记忆》成了程光先生随意指责别人的窗口，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其实，余汝信先生的指问很直白，程光先生的回答也应很直接。哪些指出的对我接受；哪些指出的不对我拿出根据（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并不是根据，因为邱将军也是个人回忆，一家之言。程光先生文中自称《对话》写了二十多年，易稿十几次，经过这么多年考证，余汝信先生指问的问题是应有定案的，但问题又摆在那里，究竟是为为什么呢？真不得其解）；哪些有争论我们继续研究探讨，问题就这么简单。著名的海外文革史研究专家丁凯文都称赞程光先生是专家，程光先生是有能力回答的，可是我们什么答案也没有得到。真遗憾，77期只开辟了一个战场，而没有提供一个研究、交流、探讨的平台。

实话实说，看了77期很不舒服。我看了不少电子杂志，《记忆》是最好的，我和《记忆》之间才是心灵的对话，当然我只是读。这次却有不祥之兆，担心。我的理由是：其一，余汝信先生的作品我也读过，应是上乘的，程光先生不回答问题又口无遮拦的指责令人不舒服，《记忆》没有把好关。其二，我先前看到朋友转来余汝信文为40多条，此次改为16条，可见余汝信先生和《记忆》有诚恳沟通且服从了《记忆》的安排，这就是君子诚交。

余汝信先生、丁凯文先生、程光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不但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充实了我的生活。现在在网上明显看出矛盾，令人心痛。实事求是地说，其原因在于程光先生确实有错又没有正确态度，关键在程光先生。有错必究，总结教训，继续前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何晓铭

8、顾训中谈余汝信、程光文：

77期余汝信与程光文，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者，这样的争论其实十分有益，可以从中得到许多仅仅只是阅读无法了解的内情，更有益于分析和理解。当然，争论最好能够避免个人意气，否则，不只十分无谓，且不利于问题的真正探讨。

9、叶京生谈余汝信、程光文：

《记忆》上拜读了余汝信及程光先生的文章,真是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我个人认为,这种争论实实在在是一件大好事,它不但可以引起广大读者进一步探究历史真相的兴趣,也可以使历史事件本身越辨越明,越辩越清晰,邱会作老将军是我们心中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他在九泉之下如果能看到自己的回忆文章能引起这么多人的研究兴趣,也许也会感到一丝欣慰吧。

目前,在文革研究领域,指鹿为马,隐恶扬善及胡编乱造的狗屁文章比比皆是,历史常常被一些自以为是,居心叵测之徒涂抹得面目全非,有些往往很简单的历史事实也被歪曲得不成样子,而不加分析的人云亦云又往往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克服的一个通病。其实历史本身只能有一个,而往往因为当事人及后人的立场观点和观察角度不同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作为我们这些晚辈读者,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些回忆录毫无误差,百分之百的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只能期盼这些回忆能够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出现大的误差就好,而在历史细节上的描述上出现差异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列宁也早就说过个人的回忆录其实并不可靠,因此如果把这些个人的回忆录来作为历史史料来引证显然是不合适了。

邱老将军的上述两个版本的回忆录我在香港书店购得后都囫囵吞枣般地匆匆拜读了，说实话，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及本人的孤陋寡闻，对二者在部分历史事实上描述的差异确实没有资格来妄加评论，我想说的只是程光先生的《对话》里，对部分历史细节的描述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好像在有些方面过多的掺杂了一些现代人才能持有的观点，这固然能增加书的可读性，但却往往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本身。如在九大的选举上邱将军鼓动游说别人不要投江青的票，说江青是反对解放军的，是反对林副主席的，这个历史细节的描述虽然使我们对邱老将军的凛然正气不禁肃然起敬，但确实难以令人置信，也不符合当时大历史的特定环境，这些还望程光先生能够拿出能够进一步印证的历史证据。

于香港

2011年10月26日

10、一平谈程光《我的一九七一》：

程光的《我的一九七一》中有一处史实性错误：文中说，1971年五月初的一天中午：“……秘书又报告，从化的朱德委员长那儿打电话来，说他想见一见黎笋。父亲想了一会儿，对秘书说，要个北京的长途，总理那儿。”“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周恩来批评他说：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是主席的决策，主席对朱的严厉批评已有多次，朱想见黎笋，以什么身份见？委员长？登不登报？不登，外宾怎么想？我们只能听主席的，难道你还要为此事去打扰主席？”

实际上朱德1970年7月就回到了北京（住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直到去世），而后参加8月份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明确发文规定，除原来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员外，重大事情的研究，要请叶剑英、董必武、朱德参加，刘伯承、谢富治有病可以不参加。1971年4月朱德还参加了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五一”朱德参加了群众联欢活动。十几天以后，即程文说的“五月初的一天”，邱会作和耿飏陪黎笋到广州。此时朱德在北京，不在广州。请看《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1970年 八十四岁

七月 接中央通知，离广东从化回到北京。

4、要夫人康克清给中央办公办公厅写报告表示“希望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安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随后安排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至此，搬出中南海，住在新六所一直到逝世。（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971页）

1971年 八十五岁

5月1日 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会。（出处同上，1973页。另，朱德、李富春参加北京1971年五一活动新华社亦有报道，见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

由此可知，朱德不可能要求见黎笋，也不会有邱会作的请示和周总理的批评。

顺便说一句，1970年7月，中央派专机到广州接朱德回北京的时候，我就在机场，看到了正在那里休息的朱德。那架专机接上了朱德、康克清后，飞到长沙接上叶帅。一个月后，朱德、叶帅都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去了，会后没有再回广州。

另外，《我的一九七一》中还有一段话值得商榷：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父亲在晚年才对我说了。父亲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

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 ,会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呢。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 父亲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 ,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 ,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 ,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 ,她就不知所以然了 ,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邱会作是 1971 年五月初陪黎笋到广州的。《周恩来年谱》载：几天前，即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代表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了政治结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会毛泽东坐在江青一伙那边，此前黄吴叶李邱都做了检讨，他们被“打趴”了，江青一伙神气了。这个会丁盛、刘兴元都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恐怕不会跟丁盛讲上面的话，丁盛可能也不会问邱会作“怎么防江青”这样的问题。

一平

2011 年 11 月 13 日